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③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 ④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⑤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⑥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⑦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⑧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⑨ 中国市场名城
- ⑩ 中国地热城
- ⑪ 中国书法名城
- ⑫ 国家园林城市
- ⑬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⑭ 国家卫生城市
- ⑮ 国家森林城市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赵 强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王庆和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沂蒙反“扫荡”
——父亲罗荣桓1941年的抗战历险 罗东进 04

【峥嵘岁月】

郯城大捷 曾国华 08
忆大青山突围 刘 奇 15
铁军大帐追歌行（五）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7

【名人素描】

李竹如：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烈士 于岸青 23
善政宜民一儒生
——清代郯城籍官员吴步韩 乔 闪 29
从绿林好汉到八路军传奇司令（下）
——记刘海涛 王卫东 王 欣 32

【文化掇英】

沂水县石栏村“双龙碑”的传说与真相 刘海洲 36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四）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39

【蒙山沂水】

打散场 刘振本 42

【探索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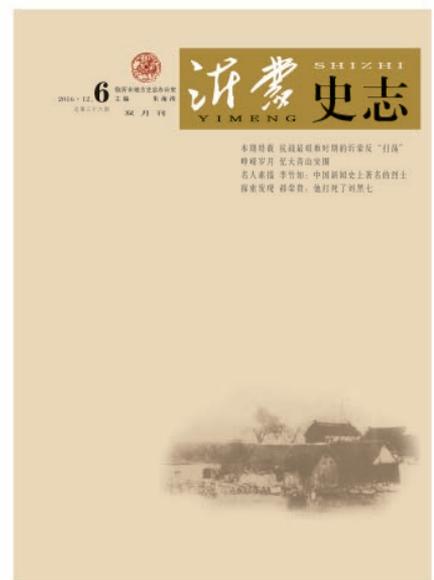
抗战旧址之一——峯县南塘村 本 编 44

| | | | |
|---------------|-------------------|---------|----|
| | 郝荣贵：他打死了刘黑七 | 高 雷 | 45 |
| 【史海撷萃】 | | | |
| | 空谈误国属王衍 | 清风慕竹 | 50 |
| 【史料辑存】 | | | |
| | 1945年我军进入东北部队详细组成 | 2503387 | 53 |
| 【诗画赏析】 | | | |
| | 刘中策、刘中瀚书法及佚名画册（下） | 高 昂 | 54 |
| 【文明之星】 | | | |
| | 张广秀：一位沂蒙女儿的不朽青春 | 英 国 | 56 |
| 【影像沂蒙】 | | | |
| | 沂蒙根据地反“扫荡”（上） | 本 编 | 60 |
| 【百家渊流】 | | | |
| |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三） | 赵丹峰 | 62 |
| 【典籍考辨】 | | | |
| | 丁守存和《编年自记》（下） | 丁兆铭 | 68 |
| 【沂蒙名医】 | | | |
| | “精诚”三解 | | |
| | ——近读高树迎 | 惠东波 | 75 |
| 【史志动态】 | | | 80 |

封面： 峰县南塘村

（详见本期《抗战旧址之——峰县南塘村》）

封底： 与人善言，暖若布帛；伤人恶言，深于矛戟。《荀子·荣辱》 /胡石 书



地 址： 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 276000

电 话： 0539-8727560

邮 箱： 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 <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 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沂蒙反“扫荡”

——父亲罗荣桓1941年的抗战历险

罗东进



抗战期间，罗荣桓一家在莒南的合影（左二为罗东进）。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2000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4日，日军从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围拢留田。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形势十分严峻。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大本营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安全一些。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

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到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花生地里拣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也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1941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

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沐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主动权。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作者简介：罗东进，罗荣桓元帅之子，生于1939年2月。1959年参军，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二炮兵副政委，中将军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



1961年，罗东进与父亲罗荣桓合影。

郯城大捷

曾国华

1943年春，山东敌军把“扫荡”的矛头指向我滨海区沭河沿岸，企图打通临沂至青口的公路，完成郯城至重坊的“堡垒封锁线”，以扼杀我滨海抗日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们改变了过去的分散侧击，采取“敌进我进”，重点破袭，积极歼敌。滨海军区党委决定拔掉敌军所占重镇郯城。战前军区动员了万余名群众对临沂至郯城公路进行了四天的大破袭。地方武装部队把“扫荡”之敌紧紧缠在沭河、醋大庄一带。主力教导二旅则连夜奔袭，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象夜虎下山，直扑郯城。

郯城县在陇海以北敌之心腹地区，鬼子在这里从军事、政治到经济，苦心经营了两年，特务机构庞大，爪牙四伸，周围的临沂、码头镇等地派设重兵把守，城内常住一个小队鬼子和千余名伪军。城外壕垒交错，城高难攀。它严密控制了我们的鲁南和滨海根据地交通，成为敌人屯集枪弹、粮食的重镇。



攻克郯城一一五师
教导二旅的英雄们

部队紧张地准备了一个多星期，研究敌情，确定了打法。一个规模巨大的攻城战斗就展开了。

11月18日夜晩，我和符竹庭政委率领教导二旅四、六两个团及一些地方武装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郯城，拂晓进到城东边30里的山沟里。从这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坐落在临（沂）邳（县）平原上的城池：城墙高大，四角炮楼林立，黑森森的好象窥视着四外荒芜的田野。

攻这么大的城市，在山东还是头一次。没有炮火，没有充足的弹药，要全靠攀城强攻。不管怎样，必须拿下它来！粉碎敌寇“扫荡”计划，鼓舞人民抗日情绪，给反攻打下个坚实的基础。

白天我们封锁了消息。我带着干部着便衣接近了城池，对地形作了详细的侦察。城南地势较高，北边低洼。因而确定六团一营在南边主攻；四团在北边佯攻；另外抽几个连在西南角、城东等地牵制敌人；以多面攻击分散敌人兵力。地方武装及六团的几个连则分配在城北、城西，准备阻止增援之敌。

奔袭攻歼，必须速战速决。19日晚上我们就发起了攻击。突破口选择在南关，这里没有外壕，从南门出来就是一条南关大街。大街顺城向右拐，西边尽是些低矮的房舍，很便于我们隐蔽接近。

刚开始发起攻击，我就打电话和六团联系。这时前边枪声大作，接着是一阵爆炸声，震撼着荒冷的田野，电话声音很不清楚。只听六团团长贺东生同志在耳机里喊：“碰了鬼！里边还有一层！”听到这个突然的情况我不由一愣，显然敌人在南关构筑了双层城门，炸开一层，另一层又阻挡了战士们前进，我摘下耳机就往前跑。

城关下，炮火弥漫，火光闪闪，敌人把城下的房舍打着了。战士们在火光中跑来跑去，抢送弹药、伤号。我们暂时停止了进攻，敌人在城上仍然猛烈的射击着。人声嘈杂，无数黑影从左右城墙上向南关涌来！

贺东生同志非常恼火，因为敌人不只是在南关设立了两道城门，而且里面还堵满了沙包，无法实施爆破。我和贺东生同志研究一下决定用梯子攀城强攻。但敌人在城上增加了兵力，成批的手榴弹投下来，架梯子组简直无法接近城墙。我们伤亡很大。看看天快亮了，贺东生这位虎将还要攻，他自己甚至要带领突击队。不能蛮干，我命令六团立刻停止攻击！

白天，我苦思着。打郯城是我们二旅提出来的，这是个责任问题；同时这一作战方案经过分局批准后就是使命，关系着滨海区千万人民生死存亡的使命。我们不能打下它来，影响着滨海区形势的发展。

斗争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攻击受挫，延长了时间，而奔袭攻坚又需要迅速解决战斗。城里守敌虽不多，但周围据点的敌军会闻声增援。而且这边一打响，敌人“扫荡”的主力也一定会掉转头来，到那时就糟了。攻坚前，我们虽然对敌情作了周密的研究，了解到敌人外出“扫荡”后，郯城周围据点只留少数兵力。北边临沂大概有一个中队，城西北码头镇有一个日军小队。他们不能全部出来，就是出来集中也得两三天，何况临沂至郯城的公路被我们破坏了，这就更加迟缓了敌人的行动。我们准备四天内打下郯城，待敌人主力调回来增援，我们已胜利而归了。但现在我们已经失掉了一天，还剩三天了。今晚无论如何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时间一刻也拖延不得！否则，我们在援敌攻击下撤走，敌人便会更加狂傲，反“扫荡”关键一仗受挫，形势会对我们十分不利。

我内心十分着急，立刻到六团指挥所去召集各团的干部来开会。

四团昨天在北门佯攻，听说六团攻击失利后决心要从北门给敌人一个厉害看。

六团团长贺东生哪肯示弱，对我说：“老六团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天登不上城，你就，你就砍了我！”我说：“问题不是光下决心。北边地势洼，主攻方向还应放在南边，不过突破地点应该换一换。”事实上南关的敌兵早已加强了戒备，兵力火力都增加了，再要从那里打是不行的。贺团长提议从东南角干，那里敌人认为有个大炮楼可以依托，所以戒备很差，是个理想的突破点。但那个炮楼总是怪碍事的，一时不好解决。最后研究确定：今天晚上从南关和大炮楼之间用火力掩护，架桥强攻。

夜晚，天地间黑漆漆的。寒风滚滚，在空旷的田野里呼啸。北边，火光忽隐忽现，使人想起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在沭河沿岸，民兵群众正与敌寇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以配合我们的战斗。他们在渴望着胜利，渴望着迅速摆脱身上的压迫，而我们却迟迟的，一时不能解决这里的敌人。城内不时的地来零落的枪声和爆炸声。

一行行的战士从我身边跑过，沉重的木梯、便桥木料在他们肩头上咯咯作响。有些战士悄悄向我打招呼，从我身边跑过。我听着他们的声音，望着那火光闪动的城池，思想怎么也安定不下来。记得自从我开始带兵那天起，更正确地说，自从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那天起，党教会了我怎样去爱护每个战士。每当我目送着他们去攻击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不过这决不是忧伤，我在为战士们自豪。我希望能在战斗胜利后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种愿望，重重地鞭策着自己，使我对战士们即将走过的每一步路作精心地思考，为他们的安危焦虑，甚至想带着他们一起去冲杀。

贺东生精悍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闪，我叫住他：“老贺，再扛两门手炮到突破口去，多配备些重火器！”

两天来，甚至当我们对城池作第二次攻击时，周围据点的敌人仍无动静，仿佛他们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不大在乎。今天白天，码头镇的鬼子曾到郯城来了一趟，但只留下一个小队守城，其余的又走了。他们说：“毛猴子抢点东西就走！”可是他们忘记了中国那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老话了。鬼子管我们叫“毛猴子”，是因为我们在平型关顽强而又灵活地揍过他们。现在，他们仿佛把那一切都忘了，那么就再来尝尝滋味吧。

十时，城东南角枪声大作，又是一阵阵爆炸声。从远处望去，城墙上火光闪耀，敌人在城墙上举着火把来回跑动，火花飞舞，越着越大，随风传来叫喊。今天主攻的部队是六团三营八连，我打电话询问六团攻击情况，对方讲话声音不断被杂乱的枪炮声打乱，什么也听不清楚，找贺东生团长也找不着。后来，对方显然听出我是旅长，费了好大劲儿才喊了句：“团长到前边去了！”这个伙计，打起仗来总是把指挥位置摆的离突击队近近的，可这样他还不满足，枪一响就向前边跑，警卫员扯都扯不住，有时竟叫上边找不到人。不过也难怪，蹲在指挥所里有时是很难了解前边情况的。我也有些耐不住了，放下耳机对符竹庭政委说：“我去看看。”他看我一眼马上站起来：“你在这掌握全盘，我去！”我一把拉住他说了句：“我跑得快！”就跑出了指挥所。

我带着警卫员在田野上飞跑，旅指挥所距城不过五六里路。一会，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南关大街，钻过几所燃烧的房子，在距城不远的一所破房子里找到了贺东生。他正和三营长比手划脚的讲些什么。见我来了，他报告了情况后马上要把指挥所位置向前移。这里已经是营指挥所了，还移什么？再移就到城根了。我说：“大家都在这里吧！不要因为我来了，把你们赶的向前跑。”他哪里肯听，后来我们一起来到城边，这里距外壕只有四五十米，谁也不能再向前进了，除非把城打开。

我们隐蔽在一家破房子里，从残墙破壁望去，火光中可以看到攻击部队的全部

动作。这时正是紧张时刻，战士们在敌火力下奋勇前进。爆炸声、枪声、喊叫声象山洪爆发一样吼成一片。突击队抬着又长又重的便桥，一次，二次，三次——反复向城壕冲去！

贺东生这位一刻也不肯安静的虎将，从我身边跑开了，他那洪亮的声音在人群中不断响着：

“八连长！叫第二副桥准备！”

“三营长，叫九连准备好，八连不行他们就上！”

贺东生是个坚强的干部，他和他的战士的全部动作都充分体现了师、旅党委的决心，前仆后继，顽强战斗。敌人再猛，伤亡再大，也要攻！要上！没有人能阻挡这般钢铁洪流的冲击。刚才尽管是贺东生在作战斗部署，但八连长却吃不住了，只听他在壕边喊：“八连的同志们，拿不下这个鬼地方我们不回去！”

八连连长喊出了每个人的心里话，战士们应声呐喊，一下子把那座又大又笨的木桥拉起来，直直的对着城壕搭去，但由于用力过重，木质太脆，猛听咔嚓一声，木桥从中间折断了。搭梯组的战士拉着木桥，刚踏上便桥就随着惊人的声响，一下子掉进深深的城壕里。

时间在飞逝，已经是午夜11点多了！

贺团长气极了，把拳头猛的往下一捶，命令：“再来一副！”

又是几十个战士簇拥着一副便桥，一伙人推着桥的下端，另一伙人用长长的绳子扯着桥的上端，在火力掩护下一齐往前涌。我们的机枪、火炮打得城墙直冒火星。火光中人影闪闪，便桥扬起长长的脖子，象一门大炮似的在人群中摆来摆去。尽管敌人机枪打得地上吱吱乱响，尽管手榴弹在人前人后爆炸，但战士们仍然直着腰（抬着便桥前进，不能弯腰）迎着弹雨前进。前边的倒下，后边的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又跟上去！阵阵硝烟扑来，辛辣刺鼻，人们口渴舌干，神经紧张到极点。每到战斗紧张处，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也真想提着两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去拼杀！贺东生团长从这里跑到那里，哪里打得激烈，哪里就听到他的大嗓门，好几次他甚至和架桥组一起往前冲。指挥员那种需要冷静下来为战斗胜利考虑问题的责任，使我不得不时刻提醒，叫他安静下来。我说：“老贺，要善于发挥下边的力量，不要总是跑来跑去。”他看我一眼，说：“对！对！我——跟战士们在一起冲，多痛快！”他把帽子用手往下一拉喊着又向弹片横飞的火光中跑去。

随着一阵沉重的响声，木桥“咚”一声，搭落在宽宽的河对沿。一些战士生怕不牢，又跳下黑沉沉的被炸垮的沟沿上，结结实实地踏实了两岸的道路。

一队队扛梯子的战士从上走过。桥在英雄们的脚下抖动着，吱吱作响。

象经历了天大的喜事，贺东生跑过来，抓下帽子喜滋滋地喊：“搭拢了，这个鬼东西！”

我说：“过了壕就决定了一半胜利！”

他笑了，接着象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说：“突击队上了我就上！”

我没作声，可他却在那些嘿嘿笑了。

城墙上一片混乱，敌人想不到我们竟顺利通过外壕，由于恐怖、惊骇，变的更猖狂。城墙上叫喊声，骂叫声，哨子声，乱哄哄象猪群在屠刀下嚎叫。南关上的敌人向这里涌，机枪又朝这打，手榴弹在城下炸起一道火墙，弹片飞舞，硝烟遮挡了人的视线，令人难辨四周景象。

我不了解部队发展情况，离开自己指挥所位置，对着紧张的人群喊：“贺东生！贺东生！”

一会儿他那黑黑的脸孔，从人群中闪出来，我说：“一营在南关怎么搞的？应

当把敌人拖住！”

他回答我说：“已经派人到南关去了。”

停了一会，南关枪声大作，城上敌人更加慌乱。

参谋来向我报告：四团在北门佯攻顺利，已经搭上便桥，正在架梯子；西南角佯攻部队也打得很激烈，城上的敌人，好象有了增加。好！我们的预期目的达到了！我叫参谋立刻通知各佯攻部队的干部：决心要硬，攻击动作要猛，叫敌人不能各处相顾，尽量给敌人造成即将从那里突破的错觉；特别是四团，要争取砸开北门。不要害怕死亡，在战斗中指挥员决心不硬将会给部队导致更严重的损失。

一架架梯子被抬过对岸。转眼间，在一阵振奋人心的怒喊声中，三四架梯子，高高地，有如无数把利剑，一下子从火光闪照的夜空中钻了出来！

人群蜂拥着向上爬。敌人在绝望地喊叫：“上来了！八路上来了！”滚木、手雷呼隆隆地投下来，在集密弹雨中还夹杂着瓦斯弹，辛辣扑鼻，呛得人头昏眼花。战士们痛苦地干咳着，爬上梯子的人有些支持不住，又滚下来，卫生员在忙着抢救，一副副担架从我身边跑过。此刻，对我们当指挥员的是个巨大的考验，这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紧张到顶点的时候，如果动摇了下过几次的决心，便会前功尽弃！

已经是下半夜三点钟，离天亮只是一两个小时了！

要突破这最后的关头！我刚想吩咐贺东生派九连去支援八连，猛听的城下有人在喊：“是钢是铁，宁折不弯！是英雄是好汉跟我来！”

这洪亮的声音，使昏迷的战士猛醒，犹如黑暗中一盏灯火，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我不知道这个战士的名字，但，这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战士。这是英雄的声音，党给了英雄以力量。这是党的声音，是战斗的号角。是它在鼓舞着同志们去奋勇战斗。我为我们党有这样的战士自豪。

那个喊话的人，头一个爬上梯子，许多人马上跟了上去。

一连串的黑影在火光闪照的城墙上窜动。火光中，他们的身影显得更高大了，仿佛不是许多人在爬城，而是一个巨大的人在摇撼着那阴森的城壁，使它不得不在那巨大的无法估计的力量下塌倒下来。

随着逐渐向上爬的人群，我的心也被提的高高的。猛然，一伙敌人向那爬的最高的梯子冲来，向下投弹，用长杆子去推那搭在垛口上的梯子。一些敌人在我们射击中倒下，一些又冲过来。忽然，梯子被推起来，随着一阵惊叫声直直悬在半空中，但又一伙战士冲向梯脚，用力把梯子按住。这时那个刚才喊叫的战士已经头一个接近垛口，他的身影在火光中一挺，刚要攀城，接着就被什么击中了，沉重的身体在半空中打着跟头，从后边人的头上滚下来。他牺牲了，没能看到胜利，但他的声音却鼓舞着后边的人，他们不顾一切奋力爬城。

第二个战士、第三个战士——又没有攀登上去，高高摔下来。第五个战士接近城垛。他没有立刻爬城，却把身子向下一缩，向城上飞快扔出几颗手榴弹，浓烟飞腾，再一看，他已经窜上了城，灵活的身体一闪，向左右敌人接连扔出几颗手榴弹。晨曦中，他那矮小结实的身影显得更加清楚了。

这战士灵巧勇敢的动作使我惊喜，不由的喊叫起来：“看！看！飞上去了！那是哪个？好快呀！”

以后，战斗下来我才找到那个战士。他叫张桂林，矮胖结实，红脸庞，大眼睛，十分机灵。是他头一个登上城墙，并巩固了阵地，党委给他记了功。由于他蹬城动作灵活勇猛，仿佛是飞进去的，所以人们叫他“飞将军”。一时，“飞将军张桂林”的名字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这时，许多战士登上了城，我们的机枪也在上边叫起来。敌人想堵缺口，战士

们一阵手榴弹给砸了回去。接着，轰隆一声那个东南角的大炮楼也被我们炸垮了。

占领阵地的号声响了，欢呼声从城下飞上来，在被压抑多年，死沉沉的城市上空飞扬。

我十分高兴，不由得对贺东生喊：“老贺，上城，走呀！”

他笑了，一推帽子：“走！”

登上城楼，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叫六团派一支队伍从城墙上向东北方向打，另一支向西南方向打，然后从西边向中心压，主力从正面攻，并派队伍赶走南关残敌，迎接后续部队入城。务必争取太阳出来结束战斗。

北门枪声激烈，四团派人来报告，他们已经登上城了。进展顺利，如果没有什么阻碍，太阳出来时完全可以结束战斗。

但，我刚走下城就听见西北边重机枪响，接着侦察员匆匆跑来报告：码头镇来了援兵！我一惊忙问：“多少？”

“三四百！”

到底来了！不过，我们周围有两三千担任打援的部队，不怕它！

六团也派人来报告情况：残余敌人向城中心退缩，企图顽抗。

情况紧急，能不能最后占领城市，首先要看能不能堵住援兵。

旅政委符竹庭同志，带着指挥所人员从城外进来。我俩分了工，他去组织城内战斗，我带四团一个营奔西关去支援那里的打援部队。

我赶到西关，只见公路上、水沟里尸体累累。六团英雄连长何万祥满头大汗，上身只穿了件短褂，衣服上血迹斑斑。敌人兵力超过他三四倍，他们竟顶住了。

这时天已大亮，城里敌人打出了一个红色伞状的求援信号。我一边叫四团那个营从右边抄过去截敌人后尾，一边派人给城里送信。告诉他们敌人已经被顶住，应该赶快解决残敌。

城外展开一场激烈的肉搏战。何万祥光着膀子旋风似的向敌人扑去，一连刺倒了两三个敌人。战士们学着连长的样子在敌群中左右冲杀。四团那个营抄到敌人后边，立刻和敌人杀在一起，堵住了敌人退路。大道上，田野里，尘土飞扬，灰蒙蒙



的，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敌人拼杀不过，杂乱地向西突围，何万祥立即带队冲杀过去。

在打援部队激烈拼杀的时候，城里也打得正紧张。消息不断传来：残敌大部被歼，只剩下几十个鬼子龟缩到伪县政府大院里的炮楼上，顽抗待援，严重威胁着战斗的胜利。几次爆破都失败了。炮楼高，炸药只在底下炸个窟窿，敌人爬到上边去，奈何他不得。这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再拖下去，临沂来了援兵就不好办了。

击溃了面前援兵，我立刻跑进城去。在城中心伪县政府大院周围，阵阵瓦斯烟火呛得人睁不开眼。鬼子和一些伪军，伪政权人员缩在院里向外杂乱的投弹射击。院墙周围敌尸狼籍，在通往炮楼的那条路上，倒着我们的爆破手。

符政委命令四、六两团的突击部队，用炸药炸开四面的院墙，这一下子像大河决堤似的，200多名伪军、伪政权人员，马上举手涌了出来，嘴里喊着：“投降！投降！”紧接着，两个工兵爆破手把一包五十公斤重的炸药捆在一个长杆子上，在火力掩护下，穿过大院直扑敌堡。他们巧妙的顺着石壁把炸药伸到炮楼当腰，然后拉了火。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炮楼子象被什么巨大的力量，从上边一下子压下来，顿时支离破碎，砖木碎石随着一股浓烟飞得老高。

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冲，有的去抢枪，有的抓俘虏。这时我和符政委带几十个干部向炮楼走去。猛地，在我们几十步远的瓦砾堆里钻出个鬼子来。这家伙蓬头垢面，帽子飞了，军衣烂了，活象一个被石子打烂了的冬瓜。他看见了我们，便跳起直奔过来。我们一愣，警卫员拿起枪就要打，我拦住他，量那鬼子赤手空拳也不敢作恶。果然那鬼子看警卫员要打他，忙跪了，膝行到符政委身前，然后举起双手裂开嘴笑笑，跳起来，冷不防抓下符政委的帽子，顶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举起双手，弯着腰，哇啦啦喊叫着：他是来投降的！这副怪样把我们都弄笑了，老符笑的更厉害，拍拍那鬼子的臂膀，对他投降表示接受。那鬼子也拍拍符政委胸前的望远镜，摇摇大拇指。原来他从这副望远镜认出老符是指挥员，来投降乞求保护，也许他认为这样做生命更安全些。鬼子投降也会找窍门哩！

激战两天两夜，郯城终于被我们占领了。成千上万的老乡们走出来，向我们诉说，给我们烧茶倒水。各处的农民听说郯城被八路军打开了，纷纷赶来搬运粮食。几百辆小车，几百头毛驴驮着鼓鼓的粮袋向城外涌出，看不到头，望不到尾，街上人声嘈嚷，喜笑颜开。

敌日军顾问以下600多人作了俘虏。最后战士抓来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他是日本粮行经理，叫山井。几年来，他搜掠了我们农民几千万斤粮食。但此刻他却拿出一副可怜相，哀着求我：“八路厉害的！我明白，我的商人，罪过没有。”

“什么？！”我厉声喊着：“看！”县政府大院粮库前，黄澄澄的谷子向外淌，有的已经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农民们都在愤怒的骂着。

山井垂下头，下巴抖动着，喃喃地说：“完了！完了！”

为了彻底摧垮敌人这个兵站基地，第二天，十几万农民参加了扒城工作，敌人苦心修筑的城堡，被彻底摧毁。

郯城大捷使敌寇闻风丧胆，我们则乘胜拿下了郯城周围的归义、大埠等十几处敌伪据点。一时声威大震，迫使“扫荡”临沂地区的敌人全部撤兵，建立堡垒封锁的美梦被彻底粉碎。敌人恼羞成怒，第五天（23日），从津浦沿线几个据点调集了千多鬼子，由临沂乘汽车直扑郯城寻机报复，但这时我们早已安全撤离了，等着他们的只是万分难堪的失败。

忆大青山突围

刘 奇



刘奇（后左）

我当时是山东总队干部（原八纵前身），1941年夏调入抗大一分校学习。同去的王勇同志，编入政治队，我编入女生队。

这年11月，日军5万人的兵力，包围沂蒙山区。当时，抗大（一分校）、一一五师、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首脑机关被日军包围。

女生队被几挺机枪围堵在蒙山的大古台。在沟内，我抬头看到穿黄衣服的鬼子兵和穿黑衣服的汉奸狂叫：“捉活的！捉活的！”

我们从沟底下向西快跑，王秀英突然中弹倒下了。我扶起她一看，胸前流血，要扶她走，她说：“我不行了，你快跑吧。”

在前边麻文轩同志又倒下了。刘志爱烈士女儿（编者按：疑似为烈士刘晓浦女儿刘增蔼）也牺牲了。杨明同志左耳打穿了，脖子流着许多血。

我弯着腰向前跑，前边不远处持枪卧着一位军事队同学，不知他的名

字，他正持枪打阻击，看到我还在跑着，急得就骂：“该死的东西，你卧倒！”

我立即卧倒，问他：“为什么骂我？”

他说：“你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敌射击时你要卧倒，他换弹梭子时你再跑，不要向西南方出沟筒子了，你看那里路都看不清了，许多同志牺牲在那里，你应向西北方向翻一道山梁，向西蒙山突围。”

我说，西北山梁容易暴露，他说：“你不要害怕，大盖枪不容易打着你，沟内敌九挺机枪扫射。”

我一气奔跑，翻过了大高山梁。前边是一条小河，我砸开薄冰，喝了两缸子水，才过了河。

爬上西蒙山，到了山顶，遇上了张达队长。她正在流泪，我问洛林指导员：“队长怎么哭了？”

指导员讲：“她爱人牺牲了。”

队长讲：“你正在发疟疾，快到医疗队去吧。”接着喊队伍集合。

我到了望海楼山下休息时，棉袄被汗水湿透了，一拧袖子就往下滴水。

夜间，到抗大医疗所。看到很多伤员，我走进一间小房子，问：“有人吗？”

里面一名伤员叫着我的名字说：“你给我搞点火来，我想抽烟。”

我说：“到哪里弄火？”

他说：“老百姓锅底还有火，你弄点柴草吹着了，就能点烟。”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我叫王勇，是腹部受伤，肠子流出来了。你给我往家写封信，地址是青州县××村，告诉我父母，说我在外很好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小房间里看王勇，人不见了。

我问医生：“王勇伤情怎么样了？”

医生低沉地说：“他已牺牲了，刚掩埋在后面山坡上。”

医生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我是他的战友，一起来抗大的同学。”

我看到一个担架抬着辛锐（姊妹剧团团长），她膝关节被烧伤，怀孕三个月了。

她问我：“看到陈明没（她爱人，省战工会副主任）？”

我说：“没看到。”

后来我才知道，陈明已牺牲。

不久，敌人来搜山，我们都钻进山洞里。民工都跑了，辛锐被敌人刺死在担架上。

夜里，我们到山下背粮食用，自己的单裤（中式）将裤腿、裤腰扎起来，背粮上山。那麦子和高粱都被敌人放火烧糊了，只能用磨推成糊状，拌着水煮熟，一起吃。

几天以后，敌人退了。我们找老乡帮忙，去大古台掩埋烈士的遗体。牺牲的全是干部队学员，场面惨不忍睹。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想，那位救我的同学是否还在？我是那次突围的幸存者。

我永远缅怀牺牲的抗大战友们！

铁军大帐追歌行 (五)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南陵县土塘——脱手斩楼兰

(1938年5月26日——1938年7月28日)

土塘新四军军部位于安徽省南陵县南部的三里镇土塘村，如今是吕山村的一个自然村。这里邻近泾县，遥望云岭。村后有座青山，当地人称其为“大山”。大山其实不大，山坳间流下的溪水雨水，在村后形成一个半亩地大的水塘，四季不涸，清澈见底，明亮如镜，村名由此而来。村子建于山坡上，房屋一座座顺势由下而上，如同站于层梯之上。村子也不大，立于山坡顶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现在也只有百余户人家，500多口人。

周围及村里的群众，几乎都知道当年这里曾经住过新四军，但不知其详，有人



南陵土塘军部旧址

还说这里住的是新四军的一个团部。后有热心老乡带领我们去拜见了一位名叫徐逢元的老人。老人90多岁，身体还硬朗，可惜只是严重失聪。我与老人交流，不得不贴近老人耳朵，努力提高嗓门，放大分贝，还得使用些肢体语言以为辅助。见我此状，老人家忠诚的大狗“黑子”便误以为我对其主人有进攻嫌疑，遂向我“汪汪”大吼，誓死捍卫主人的样子。老人的儿子老徐只得代父亲向我们说些他知道的往事。老徐60多岁，当过几年乡村教师，很热心于研究新四军的历史。他告诉我们，他的叔爷爷当年曾经是新四军老一团的一名队长，穿着灰军装，挎着盒子炮，忙着打鬼子。国民党顽军不打鬼子，专门跟新四军作对，把他家里的人抓了去。新四军也不是好惹的，以牙还牙，派人抓了家也在当地的一个顽军头目的爷爷，顽军无奈，只得与我们“以爷爷换祖父”，交换了人质。老徐清晰得记得新四军军部当年在村里的旧址，带领我们去寻访。旧址在村子中央，是前后两座房屋，看房屋的架势，也是小村里的“大户”人家的住宅，至今保存完好。

至于军部在土塘村为何只住了两个多月便迁往云岭的原因，老徐言道，听老人们讲，是因为新四军不愿意与百姓争水。土塘村其实是个十分缺水的小山村，村后当年的池塘也只是个小水坑，平时积蓄下的一点山水，仅够全村人口吃水饮用，一到少雨季节，老百姓就只能干舔嘴巴。新四军军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撤出了土塘，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但从地理位置与环境上看，土塘村处于狭窄山地，村无一亩平，举步是坑洼，交通不便利，进出很窘迫，很难搁下一个偌大的军事指挥机关，也很难对外往来和沟通。另外，南陵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的防区，离日寇控制的长江也很近，军部随时都可能处于日、顽夹击中。为此，叶挺、项英指示军参谋处在向南纵深的泾县一带为军部寻找新的合适的驻地。赖传珠立即派人进行侦察，最后选定了泾县的云岭，并报军部首长研究同意。

一、郁闷叶挺二辞呈，机智周公徒平衡

1938年5月26日，叶挺军长率领新四军军部，由太平县麻村进驻南陵县土塘村。

军部于土塘安扎好后，心事重重、百味杂陈的叶挺即于6月初急匆匆地赶到了武汉。

叶挺此次武汉之行，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给新四军增加军费。经过他反复交涉与努力争取，最后结果虽不能说如愿以偿，但是国民党当局毕竟同意给新四军增加一些经费。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一下新四军的燃眉之急，总比空手而归要好得多。而且，叶挺感到，作为一军之长，自己目前能为新四军所做的，似乎就只能是这些事情了。

第二件，是面见周恩来，报告他在新四军中的尴尬处境和与项英的矛盾，请他尊敬的“周公”帮助解决面临的困惑与郁闷。6月7日，叶挺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他抢上前去，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周公，我在新四军没法再干了！”话刚出口，堂堂七尺男儿，竟然像个倍受委屈的孩子，叶挺的眼睛泛起了泪光。

周恩来见状大惊，急忙安慰叶挺坐下来，让他缓和下情绪，有什么事情与问题慢慢道来。

叶挺在大革命初期，就追随周恩来干革命。组织上他是周恩来的下级，政治上他视周恩来为同志，友情上他把周恩来作知己，感情上他将周恩来当兄弟。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紧紧地跟着重病的周恩来，掩护他撤退、治病。他在周恩来面前向

来直言不讳，无话不讲。于是，就把满肚子的难言之隐“竹筒倒豆子”，一下全部吐了出来。

叶挺这次向周恩来报告的，是他与项英的分歧与关系问题。原来，自从项英两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电报反映了他自己认为的关于新四军的战略行动方向等“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等意见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曾在《五四指示》专门提醒与嘱咐项英要“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实事求是地讲，在早期，项英在思想深处把叶挺还是看作是我们党的“特殊统战对象”的，互相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生活上对叶挺特殊照顾，对外交往由叶挺出面等，而没有把叶挺当成自己的同志。毛泽东对叶挺称同志，项英自然知道其中的用意。自此，他在日常工作中，采取了不少办法，尽量改善与叶挺的关系，特别注意体现对叶挺的尊重。军部的正式会议，他都请叶挺主持；军直部门与机关的一般工作情况报告、请示，各下属部队的报告和请示等，都请叶挺首先批阅、指示。出于领导体制关系，当时中共中央的许多来电都是直接对项英的，指名给叶挺的电报很少，如将这些电报原件送给叶挺阅，不合党的机要制度，且电文上没有叶挺的名字，反而会引起叶挺不被尊重的感觉。在处理这种情况时，项英也时时感到很是为难，有时只能用自己的口吻，向叶挺透露主要精神等。

但是自从二人在新四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出现分歧后，项英思想上开始对叶挺产生了不信任。在重大问题上，他逐渐对叶挺采取了关门主义的做法。对于本应由叶挺负责的军事问题，也很少主动地与叶挺商榷研究，而是自作主张，独自报告请示，这让叶挺十分被动。叶挺曾是中共党员和党的重要军事领导人，自然明白“党指挥枪”、军队由党统一领导的原则。他现在虽已不是中共党员，但还是像共产党员一样尊重与听从项英的意见与安排，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对于军事上应由他负责的事情，他坚持认真努力地去，而对党委的事情与决定，他坚持不该问的不问，不当管的不管。为了自觉回避，他甚至连机要电报室都决不轻易涉足。

即便如此，项英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做得有些过分。有一次，项英召集新四军党委成员会议，这些成员大多是军事主官，但说是传达中央精神，根本不和叶挺打招呼。事后叶挺才知晓，项英召集的主要是研究作战打仗的军事会议。下级军事指挥员都知道要打什么仗、怎么打了，他这个一军之长却还蒙在鼓里，一头雾水，究竟把他这个军长置于何处，还要他这个军长干什么？叶挺虽然能容忍、讲原则，但他又有强烈的责任感与自尊心。且不说对部队作战之事最后自己要负责，仅从面子上讲，让他何以自处，作何解释？就是其他人也难以忍受，更何况是性格直率而刚烈的叶挺！

项英虽然是党委书记，但他毕竟只是副军长，他对叶挺军长的这种态度和连军事大权也一手独揽的做法，连不少其他的党员干部也都颇有微词，表示否定。特别是像陈毅这样公正耿直、敢于直言的人，对项英尤其不满。后来，陈毅曾经直言道：“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他独任军事工作，自己却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陈毅或者肚中有气，直言不讳，对项英的批评甚至到了很尖刻的程度。

周恩来一向深知并且十分欣赏叶挺的秉性与品格，他磊落正直，心胸豁达，原则性强而又能屈能伸，自己很要面子又很给人留面子。这次主动来汇报他与项英的这些分歧与僵持关系，尤其是谈自己的尴尬处境与遭遇，肯定是心中实在找不到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的理由与办法了。周恩来、叶剑英都对叶挺表示了真诚的理解，进行了温暖的安慰，同时，认真地征求叶挺的意见，请问他是否有解决这种状况的好的计策与办法。

良言一句三春暖，叶挺情绪平静了不少，也诚恳地表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够真正实实在在地履行作为军长参与军事决策、指挥作战的职责。考虑到除了我自己以外，其他军部主要领导都是党员的实际情况，我提议在军部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

周恩来、叶剑英觉得叶挺的建议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非常重视，当天就联名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了电报，转达了叶挺的情况和意见。为了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担心，电报采取了报喜不报忧的简洁措辞：

甲、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乙、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亦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项、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者张鼎丞七人组成，项为主，叶副。如何，盼复。

敏感而智慧的毛泽东，立即意识到叶、项关系与分歧问题非但没有化解，而且正在继续。叶挺的建议也确为一个既保证党委领导，又保证叶挺军事指挥权的两全之策。于是，仅隔一天后，毛泽东即于6月9日给周恩来、叶剑英回复电报表示：

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陈、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副之。

叶挺本以为有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尚方宝剑”，至少可以让项英通过委员会共同商量与决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项英对他实行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这个军长不再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能参与重大军事决策，实际担负起指挥作战的职责，真正为抗战作出贡献。但是完全出乎他的一厢情愿。项英一看便知，党中央的决定不是空穴来风、无风起浪，肯定是叶挺向中央反映了情况和问题，中央才作出了这个决定。他对此事不免产生了一定成见，对中央关于成立新四军委员会的指示，有意无意地拖了下去。

叶挺在由希望到变为失望的盼望中煎熬了一段时间。然而不久，项英接到了中央要他赴延安参加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7月28日，项英离开土塘赴延安开会，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一事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周恩来在叶、项之间的努力平衡也落了空。

二、陈毅豪言气万丈，寇能往我能往

就在军部进驻南陵县土塘村时，军部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派出的先遣支队，在司令员粟裕的率领下，已经顺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

粟裕是我军一名有着高度军事指挥能力、水平与丰富经验的优秀将领。大革命时期，他投笔从戎，投身于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当学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从连长逐级提拔到师长、军参谋长。1934年7月，他被任命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队长。红军长征后，他又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在浙江南部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他既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又有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这次，他是第二次担任先遣队长。而且，这一重要任务，也非他莫属。

粟裕率先遣支队于4月28日从潜口出发后，经青阳，过南陵，涉青弋江，穿越宣城铁路封锁线，连过东风渡、仇公工渡、杨四渡，到达金宝圩北燕翅镇，经过近一月艰苦跋涉，终于于5月22日抵达苏南敌后的江宁县铜山镇西南的业家庄。随后，粟裕派出3个侦察组，分别向南京、镇江、常州3个方向深入侦察。根据侦察的情况，再率部于6月上旬越过宁（南京）杭（杭州）公路前进。这一路之上，最让先遣支队官兵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不时在高声呐喊着“我们是铁军”的口号前进。部队



新四军第1支队
向苏南敌后挺进

沿东北方向挺进，离前线越来越近，枪炮声越来越清晰，火药味越来越浓。沿途之上，被日军打得丧魂落魄的国民党军队不时像潮水般从前线溃败下来。见到这支人数不多、武器又差的新四军部队却斗志昂扬地反其道而前进，一些国民党官兵就连嘲讽加警告地喊叫：“鬼子很厉害，有飞机大炮，我们都被打垮了，你们这样的武器，这几个人，还打什么鬼子，去送死呀？！”先遣支队的指战员们则高声回应：“我们不怕鬼子，我们能打败鬼子！别看我们队伍小，我们新四军是一支铁军！”几句话，说得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不再胡叫乱嚷，灰溜溜地拔腿而去。

根据毛泽东《五四指示》中关于“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的要求，就在粟裕率领先遣支队胜利挺进到江南敌后时，陈毅正率第1支队随后前进。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欣慰之余，对数次三番狐疑不定、总是固执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项英仍不放心，生怕他又一次欲进又止。在新四军军部进驻土塘后的不几天，毛泽东于6月2日再次致电项英：

徐州失守后，敌后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部队已经行动，中央再来“金牌”，项英再次明显感到了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只得下令陈毅率领第1支队加速挺进江南，并命令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也率部随后跟进，但还是把第三支队留在了皖南。

6月3日，陈毅率领第一支队，胜利挺进到苏南高淳的狸头桥村。一路之上，见江南大地风光如画，却又遭受着日寇的侵略；国民党大军弃地而退，已经大半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苏南人民甚至把东进抗敌的新四军误认为敌人，不由让人感慨万端。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对即将开展的敌后抗战的满腔豪情，一齐涌上胸间，一首《东征初抵高淳》脱口而就：

波光荡漾水纹平，河汉沟渠纵横横。扁舟容与人如画，抗战军中味太平。
堤柳低垂晚照斜，农家夜饭话桑麻。兵船初过群疑寇，及见亲人笑语哗。
江东旧物未曾谖，梦寝吴天廿载前。此日一帆凭顾盼，重山复水是江南。
芦苇丛中任我行，星星渔火水中明。步哨呼觉征人起，欣然夜半到高淳。

闻听陈毅胜利到来，粟裕立即赶到狸头桥村欢迎，并一口气向陈毅作了5个多小时的侦察汇报，可谓具体而详，真实可信：

不利方面：主要是江南的地形特点。这里遍地湖荡，河渠密布，铁路、公路、水道四通八达，交通便捷，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动，而不利于我军行动。日寇空军、陆军、骑兵队可以到处通行，而江南虽然有山脉丘陵，但多分散孤立，没有连绵成片的高山密林供我隐蔽。这对于惯以山地做依托进行游击作战的我军，确实是个新的课题，必须认真研究与对付。

有利方面：第一，从敌情上看，日军虽然占领了江南大部地区，但兵力严重不足，只能以主要兵力控制少数城镇和交通干线，敌后活动空间很大。而且由于没有遇到有力抵抗，日军气焰嚣张，肆无忌惮，思想麻痹，防备松懈。第二，从社情上看，国民党军队及政府机构几乎全部后撤和解散，江南人民半年多没有见到中国军队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处于“真空”状态。第三，从民情上看，广大百姓对日寇的烧杀抢掠和残酷野蛮暴行深恶痛绝，可以说是遍地干柴，处处星火，只差一股东风、一支火炬，就能燃烧起焚毁日寇的燎原大火。而这股东风，这把火炬，我们新四军理应担当，责无旁贷。

结论：我党我军在江南抗日的有利条件与优势方面，远远大于不利与弱势之处，我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完全可能，势在必行。

听完粟裕的汇报，陈毅十分满意，连声称赞：“先遣队做得好，你这个司令当得好！”与此同时，1支队与先遣支队也在溧水的刷新桥村胜利会师。

6月12日，陈毅在溧阳竹箐桥官墩谢家祠堂召开全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进行部署和临战动员。在会上，陈毅说，“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尺度就坚定地握在掌中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自觉积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他豪气满怀，成竹在胸，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寇能往，我亦能往！”

陈毅一句话，鼓舞万众心。挺进苏南敌后的新四军各部，以一往无前的势头与勇敢无畏的精神，纷纷向敌人出击。



陈毅与粟裕



李竹如：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烈士

于岸青



李竹如是中国抗战史、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烈士，曾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1942年在对崮峪突围中壮烈牺牲。

李竹如同志也是大众日报社史上职级最高的烈士。

建议请毛主席题词

1939年夏天，李竹如同志在山东抗战形势十分艰苦之时，随八路军第一纵队来到沂蒙山区。这年初冬，他在《大众日报》发表了庆祝苏联革命22周年的纪念文章，是他在山东开展新闻工作的开始。与他同来山东的，还有他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与革命战友郁永言。郁永言到山东后在大众日报社担任通讯部部长，在1941年冬空前惨烈的大青山战役中壮烈牺牲。

1939年底，《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之际，毛主席发来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

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主席的题词既是对《大众日报》的希望与鞭策，也是对抗日军民的庄严号召和指示。请毛主席题词，正是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民运部长李竹如的建议。他代表分局到报社主持研究纪念创刊一周年事宜时提议，并亲自起草电报稿。几天后，毛主席用电报发来了题词。

“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

1940年初，李竹如担任了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从一开始，他就以坚定的党的立场和清晰的新闻理念主导办报，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抗战三年来的宣传鼓动战》和《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为九一记者节而作》等文中，它们分别发表于1940年的《大众日报》上。

李竹如认为，办报要讲科学性，要贴近当地实际、引导舆论，讲究方式方法，重视印刷与发行。“抗战中的新闻记者不应仅仅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并且应成为一个组织者、督促者与指导者，他比任何时期都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他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抗战和进步’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新闻记者所共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坚固地团结起来，并接受进步政党的领导，才能胜利地担负起光荣的时代责任。”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众日报》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在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下，成功进行了“联合大会会议”“皖南事变”“减租减息”等重大报道，特别是“皖南事变”报道，大众日报在当时全国报纸中领先。作为管委会主任，他亲自撰写社论和文章，从1939年11月到1941年5月，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计8万多字，至于不署名的社论和专论就更多了。

1941年冬，鲁南区委书记赵鏊英勇就义，李竹如率大众日报第一战时新闻小组，跟随分局鲁南巡视团到鲁南区处理危局，并在能“一枪打透”的危险境地中坚持对外发稿。此时，大青山战斗刚刚结束，以近千人的牺牲换来了9000人的胜利突围，但形势依然紧迫。12月8日，在行军路上休息时，大众日报电台队长刘承塾打开收音机，忽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他立即抄收后交给李竹如。李竹如随即在鲁南区党委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在总结沂蒙根据地的形势时说：“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形容根据地形势严峻，并鼓励大家只要咬紧牙关，形势一定会好转。

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形势下，李竹如率第一战时新闻小组在边联县（今兰陵县）抱犊崮下涧村，举行了纪念《大众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大会。新年刚过，李竹如接到分局书记朱瑞电报，说分局损失惨重，有部电台丢失，和中央联系中断，希望他早回分局。李竹如率部提前返回，并要求大家确保电台，“人在马达在，头掉马达掉”。日夜兼程200余里，终于在沂南县薄板台与山东分局会合，朱瑞亲自来到村前广场迎接，高兴地说，分局电台损失，曾一度 and 中央失掉联系，你们始终坚持，立了大功。

创造性建立三位一体发行体制

在沂蒙根据地，一方面，报纸面向的是流动性极大的部队和广大的农村，没有行业团体可资利用；另一方面，敌后环境之艰苦，报纸发行不可能公开进行。大众日报社只能自办发行——大众报人根据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建立了战时邮局三位一

体的体制。

1941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按照中央的指示，指定“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正式建立战时邮政机构。三个月后，李竹如建议，由中共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山东战时邮政总局。1942年2月7日，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双泉峪子村成立。

1942年5月10日，李竹如在谈到改进报刊发行工作必要性时说：“晋东南某友人在来信中说：‘……我的信是口哈冻笔写给你的……但我看到你的信，已是身穿单衣，手摇小扇之时，中间经过了八个多月。’延安《解放日报》须八个月我们才能看到……如果能很快地看到《解放日报》的全版，那是如何的欢欣呢！”“再就本省而论，过去的交通也太可怜了。去年刘处长因事赴湖西，途经×站，见《大众日报》集存成堆，交通员用以烧茶解渴……这对整个革命工作有多大的损失。”为此，“接受五年来的经验，实有集中力量成立战时邮局的必要。”

李竹如经常检查发行工作。他把地图摊开，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一问这里是否有站，是否应该设站，这样的布局是否合适。还要问某站很重要，人员配备如何，报纸几天能到该站。如发现问题，当场解决。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因此发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发行越快越好。一次，李竹如到报社作形势报告，一进门看见发行科压了三天的报纸，立即找编辑部主任查问，要求立刻发出去。作报告时，他说，同志们辛辛苦苦编辑印出报纸却被压着，多么不负责任，这是发行失职。当即宣布负责发行的人被撤职，马上换人，今后报纸绝不能压。

交通线开通后，报纸发行得到了很大改观。原来一个月也送不出去的报纸，三天就能看上，并普及到区、村，党报发行量增加一倍多，报纸威信提高。1942年10月1日起，《大众日报》改为二日刊，发行量也增加到每期8300份。由过去派订款收不上来，每月亏损三四十万，成本也保不住，到自愿预订按时缴款；并及时反映读者意见，供改进编辑工作。自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山东敌据点达3000个以上，最密地区平均三至五华里一个，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众日报重新开辟了冲不散、打不断的千百条邮路，发挥了报纸的巨大威力。当抗日军民看到胜利消息，听到党的消息时，在困苦中重又坚定信心，许多人说：“八路军在，共产党在，一定会胜利，决不上鬼子的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邮政系统，正是在战时邮政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战争时期的“多种经营”

1940年1月，李竹如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由于日寇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封锁，使日用品极其缺乏，报社印刷物资也愈加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李竹如创造性地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狠抓印刷材料的落实，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智慧。

所谓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组织了由6人组成的采购队伍到敌占区采购。二是派员到沂南县依汶开办商店“利源永”，收购花生油、金银花等土特产换印刷材料，1942年又建立了连云港地下采购线。

李竹如还在报社机关成立了大众合作社，这是战争年代的又一个创举。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供应机关文具和日用品，推销大众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也通过它采购日用品，从敌占区购买印刷材料。大众合作社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报社机关、分局机关和一一五师机关干部、战士，受到好评。可谓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李竹如认为，解决物资困难最可靠的还是发展生产。于是，工人们集思广益从最紧迫的油墨、纸张开始研究，用马尾松烟灰加上豆油、松香、皂粉、蓖麻油制成土制油墨，印出报来字迹清晰。外购的油墨每盒要15元，而自造成本仅五六元，节约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保障供给。自造油墨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接着研究土法造纸。沂南县民间早有土造的桑皮纸，工人们于是向当地人请教，用桑树皮做原料，土法造纸也成功了！李竹如得知后高兴地放下笔，跑到现场去看，并当场命名为“文化纸”。1941年7月19日，用文化纸印了第275期报纸，尽管纸面薄而脆，反面几乎能看见正面的字，但是保证了报纸的出版。接着，在沂南县阎家庄正式建厂，开始大批生产纸张，保障了三四份报纸和大众印书馆的大量用纸需求。

报社最大的经营部门当属印书机构。1940年11月，报社成立大众印书馆，专管出书，李竹如任董事长。《大众日报》发消息说，“该馆资本前已有五万余元，预计半年后可招股至十五万元以上。”到1944年7月，源于大众印书馆的山东新华书店在莒南净埠子村成立，那时已建立5个分店，9个支店，30余个分销处，出版刊物18种，编印书籍318种及其他干部读物多种，供给了鲁中高级课本，鲁南80%国民教材，滨海70%国民教材，还有通俗读物3000多份。

革命的呐喊者

李竹如对报纸工作的成熟理念和经验，来自于他早年的革命实践。

李竹如是山东利津县庄科村人，家境不算好，但母亲坚持送他读书，使他在惠民四中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5年春节，回家过年的他在自己家大门口贴了“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的对联，让马列主义第一次来到了庄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此后，他辗转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济南正谊中学、南京中央大学，并于1927年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从事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的同时，他自1935年开始，陆续主办了五份报纸：《新亚日报》《文化报》



1927年12月，李竹如（前排中）等在济南正谊中学毕业时留影。

《中国人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大众日报》。

在济南与友人办《新亚日报》时，他在报社筹备处的墙上贴了四个大字“大众喉舌”，利用报纸为民众说话，用多种笔名在报上撰写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治，宣传爱国进步思想。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他在《新亚日报》上发表署名“里”的社论，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指出言论自由乃“立国之本”“因为人民为国家之根本，人民如无过问国事之知识与机会，则对外不能共赴国难外御其侮，对内亦难众志成城共谋建设”。

1936年，他自筹资金与一群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办起文化报。鲁迅先生逝世后，他采写了一个整版的通讯《鲁迅先生之丧》，并设专栏先后介绍了几十位进步作家和学者。文化报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评论，大多是李竹如亲自撰写的。他的论述非常精辟，如他在《目前的世界新形势》指出：“在意、德称霸之后，最先受害的未必是苏联……法西斯魁首的真意，是在削弱了苏联的势力以后，先用各小国（或者英法的一部分）土地财产，把他们自己养肥，然后再与苏俄作决定的战斗。”二战爆发后的情景，印证了李竹如当年的预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李竹如被迫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却带了一筒蜡纸、一块钢板和一支刻字的铁笔。一路上，敌机轰炸，交通中断，他步行到蚌埠，不断把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印成传单，沿途散发，不断吸引知识青年加入进来，他把结伴而行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支宣传队，也为革命带来了新生的力量。

1938年，他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社长兼总编辑，1939年担任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40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在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期间，他还创建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任理事长，以及新华社山东分社，兼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第一任社长。

起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

在对抗战进行呐喊鼓动的同时，李竹如还对山东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努力。

193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蒋介石假装同意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为了揭露这种欺骗，1940年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与此同时，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作舆论准备。李竹如是山东宪政促进会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具体负责筹备工作。1940年7月，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李竹如当选为委员和文教负责人。从此，山东3800万同胞第一次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

1940年11月，山东根据地的临时参议会相继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等有关财贸、教育和减租减息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条例，这些都是李竹如组织起草的。其中《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其中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民均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还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规定“凡人民因犯罪嫌疑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之”等。《人权保障条例》经临参会通过后，在《大众日报》公开发表。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全国也是一个先例。一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

也颁布了类似的条例。

李竹如在一系列的工作中，显示了一个革命组织家的才能。有一个故事在大众报人中间广为流传：1940年春，李竹如到报社任职后不久，分局拨付给报社一笔款子，经理部长刘力子派会计去取，路程80里。晚上开会，李竹如问刘力子“钱取了吗？”刘力子说“才去取。”“几个人？”“一个人。”李竹如马上说：“这笔钱一个人取放心吗？你别开会啦，快去。”他说：“不是不相信同志，是两人好商量，战争环境万一出问题，你也说不清。”刘力子二话没说，拿起匣枪，连夜追去。二人取了款后，情况果然起了变化，刘力子他们与地方干部取得联系，组织了民兵护送，才绕过敌军驻地安全返回报社。几十年后，刘力子仍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李竹如同志盯得紧，稍许松懈大意，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1940年冬山东分局在根据地开展冬学运动，从组织、领导、动员，一直到教员哪里来，教材怎么解决，用什么办法教学，经费哪里出等等，李竹如都考虑得非常周全。为了解决教材问题，他让当时山东文化出版社负责人刘导生根据山东农民的文化程度、抗日战争和日常生活的需要，编印了一套适于农民使用的课本，通过冬学运动组织起来的青壮年和妇女儿童们为保卫根据地作了很大贡献。

1942年初，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牺牲后，李竹如接任秘书长职务，不再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职务。他根据分局关于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群众运动的指示，深入农村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参与制定了一系列贯彻中央指示的文件，使山东的各项工作有了非常明显的起色。

血洒沂蒙

1942年秋末冬初，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实行大规模“扫荡”，战工会机关向鲁中撤退，到达沂水对崮峪时，已是早晨八九点钟，还没吃早饭，战斗打响了。我军被8000余敌人包围，敌军将我军压制在东西长约一里，南北不过半里的山头上，敌人集中火力向我军阵地密集扫射、轰击。

在这种情况下，从黎玉、王建安和肖华等领导同志到军区、政府机关干部都行动起来，投入战斗。李竹如在战斗中表现得沉着勇敢、毫不畏惧。中午，在战斗的间隙，他谈笑自若地鼓动大家：坚持到天黑，一定会胜利突围。午后，数倍于我的敌人向我军发起一次次猛烈攻击，我方弹药打光，便用刺刀、石头与敌人拼杀，连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一直坚守到黄昏。天黑后我军开始突围，李竹如在翻越山顶的石墙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那年，他才37岁。

善政宜民一儒生

——清代郟城籍官员吴步韩

乔 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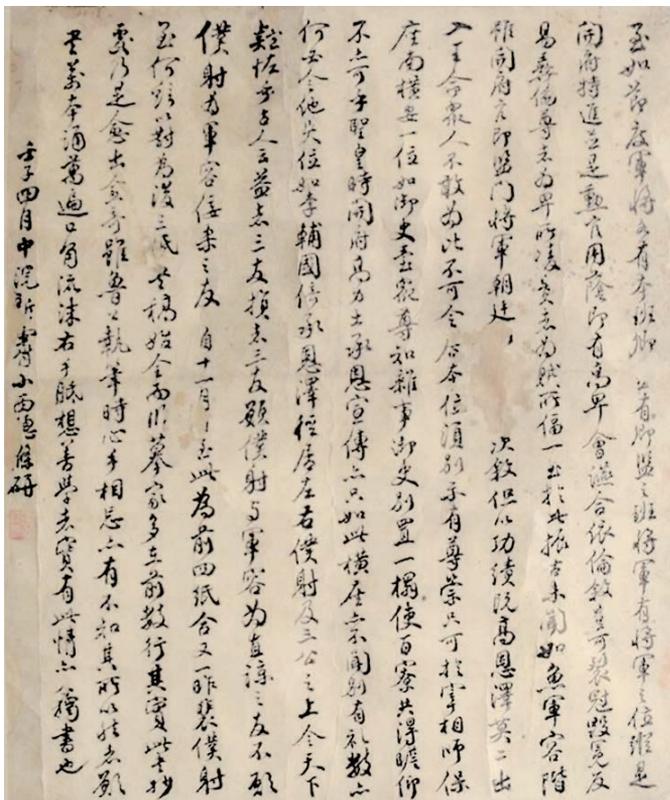
吴步韩（1798—1866），字锦堂，一字佩韦，号小岩，清代郟城县曹庄（今属临沭县）人，清代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吴步韩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天资聪慧，5岁即学诗书，11岁应童子试，17岁补学官弟子第一。他才思敏捷，善辩健谈，少年时即以文才蜚声齐鲁淮海间。25岁时中举人，33岁著书《七岌山房弃余草》，世人争相传阅。道光十四年（1834）36岁时中丙申恩科二甲第45名进士，先后任望都县知县、河北深泽知县。其治县以尊师重教、清正廉洁著称。他在辞赋、古文、经义、试律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书法别具一格，极有韵致。

据《深泽县志》记载，清道光十九年（1839），吴步韩任直隶深泽县令，作长联题于县衙大堂，上下联各76字，共152字，表达了自己想造福这一方两万多户百姓的为政追求。对联如下：

“邦畿五百里内，依山带水，谁言地偏长沙？看东距鹿城，西邻鼓国，南萦滹渡，北瞰恒阳。官此土者，如闾师，如比长，如古子男，引养引恬，要有实心敷治。漫流连高台柳月，小院荷风，古井泉香，危楼塔影；

烟火两万家余，就日瞻云，何幸躬逢盛世！想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工用矩规，商循氏族。我所思兮，为良吏，为神君，为慈父母，济宽济猛，可无善政宜民。须记取杨震四知，中牟三异，赵公双砚，刘守一钱。”

该对联上联写深泽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为官的最高准则，并以德追前贤为志，做到德参古人；下联运用多个廉吏典故，突出了为官清廉的重要性，并以清正廉明自勉。作者谆谆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到此地为官的大小官员，要做一个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清正廉洁、贤德能为的好官，以真诚的心来治理县事，实施善政，带领和引导百姓相互奉养，使当地百姓过上衣食无忧、



吴步韩书法

富裕稳定的生活，让老百姓满意。其涉及的廉吏典故较多。“杨震四知”：东汉时荆州刺史杨震曾推荐贤人王密做昌邑县令，一次杨震路过昌邑县，夜深人静时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杨震拒而不受，正色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中牟三异”：东汉章帝时鲁恭任河南中牟县令，他实施仁政，以德化人，中牟县出现了三种奇异现象，一是蝗虫成灾时不入中牟县境；二是教化泽及禽兽，与人相安共处；三是儿童有爱心不捕杀幼小的野鸡。“赵公双砚”：东汉经学家赵岐用双砚治经写字，清苦守节，廉白是务，这是对品行端悫、敦崇气节的一种自觉追求。“刘守一钱”：东汉时会稽太守刘宠有德政，轻徭薄赋，深得民心；离任时百姓对他依依不舍，几位白发老人各带一百文钱恳求他收下，刘宠难拂众意，各受每位老人一文钱，之后把钱投入江中；后人将江名改为“钱清江”，称刘宠为“一钱太守”。整副对联引经据典，对仗工整，气势恢宏浩瀚，非常有名。

雍正四年（1799），望都县令赵锡蒲在望都县城尧母祠右边兴建了康衢书院，建一座讲堂、书舍三间，置学田百余亩，招收科举士子肄业者就读，后“渐又废弛”“院宇倾圮”，杂草塞道，衰败荒芜。道光二十一年（1841），吴步韩任望都县知县，谋划重新恢复书院，南关黄桂林捐200两银子，重建讲堂三间、书舍三间、西舍十间、大门一座，因院内池莲茂盛，荷花亭亭玉立，就改名为小莲池书院（省城保定有雍正十一年1733创建的莲池书院，环境清幽，乾隆皇帝曾三次莅临该书院视察，钦赐“绪式濂溪”匾额，并多次题咏赞扬）。该书院有学田5顷32亩5分4厘9毫，每年的田租及官拨经费充裕，“自此书院膏火倍增，应课者日多，达到盛况”。吴步韩为书院撰述了《小莲池书院碑记》，刻碑立石纪念这件盛事，并撰了一副广为流传的楹联：“修我墙屋，非直为观美也，比及三年郁郁乎文哉，于斯为盛；率其子弟，又从而礼貌之，有能一日孳孳为善者，何用不臧”。对联描摹出当时的盛景，营造出浓郁的古典气息和斯文典雅的境界，也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1841年，据说他因迎送应酬不周，得罪了钦差丁某。为防构害，他的父亲吴鹤

龄听说后吞金而死，报丁忧获准，辞官回到故乡曹庄。按礼守孝三年间，他饱览故乡山川风景、名胜古迹，著文赋诗，临帖写字，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有描写故乡曹庄的“八景”诗、描写沐河栗海壮观景色的《墨林庄云林观赋》等。

吴步韩一生从事教育时间较长，培养了大批人才。出仕前，到海州当塾师时，曾经应邀给当地的士绅百姓写作墓志家传等，一天就写成十七篇文章，旁观的人无不咋舌惊叹。他经常受别人请托写字作文，不录现成文章，或骈或散，或诗或词，信笔写就，恰好写满一张纸。据说清廷官员李竹坡视学山东时，浏览了吴步韩的部分作品后，称赞他为“东省第一才子”。三年服孝期满后，改授兖州府学教授（正七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赣榆县青口镇河南村人李循礼（李六），与邻居因土地纠纷上诉到县衙，知县吴蕊元受贿，命令典史费长春把李六逮捕入狱。几个月后，其家产被办案衙役勒索一空，李六悬梁自杀。李九痛惜哥哥冤死狱中，同哥哥李七逐级到州、道直至京城都察院上访，“情辞慷慨，声泪俱下”，官员大受感动，上奏给道光帝，道光下旨令江苏巡抚办理。主审官责斥李九为“健讼”，对他威逼利诱，施以酷刑。李九虽体无完肤，却咬牙发誓：“虽死不悔！”最终两家资产荡尽。1845年，按察使陈继昌到江苏代理巡抚，亲自到庭讯问，才使冤案得以昭雪。一向关注民生的吴步韩在听说了这件冤案的原委后，挥泪写出《纪李九事》，艺人编为戏曲演出，观者如潮。

据民国范左青编的《古今滑稽联话》载，吴步韩早衰善病，年五十，已如六七十岁人，写有自寿一联，颇旷达有趣：“学昌黎百无他长，只这般视茫茫，发苍苍，齿牙摇动；慕庄周万有一似，可能够梦蘧蘧，觉栩栩，色相皆空。”“昌黎”即唐代文学家韩愈，“庄周”即古代哲学家庄子。上联说自己已垂垂老矣，而韩愈的学业、文才一点也没学到；下联说仰慕庄子，有万分之一的相似——“梦多”（化用“庄周梦蝶”典故）。自画像简练生动，自嘲令人忍俊不禁。

《峄县志》收录有吴步韩所撰“六品銜例赠修职郎马公之碑”碑文一篇，纪念的是咸丰八年（1858）带队同攻打台儿庄城的捻军作战负伤后自刎而死的马毓德，吴步韩并不认识他，但同马毓德副手的儿子李象鼎是好友，李象鼎恳求他写了此碑文。

吴步韩收藏广泛，一生收集藏书达数万卷，各代名人书画百余帧，古今碑帖、钟鼎文字各数百种，各种古砚百余方，自汉代以来的印章数以千计，金石古玩不计其数。其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收藏满室。著作有《七十二砚斋集》《虫吟小草》《续虫吟》《少作小題偶存》《绿满窗试贴》《百石山房印存》等。对联著作有《是四端斋楹联》，其对联多佳且长。可惜其著作、收藏后来大都散失，惟有《曹庄八景》诗至今为爱好者传抄吟诵，今所传《七十二砚斋集》为张宝信重编。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七十二砚斋癸甲集》稿本一卷，署名为“（清）郯城吴步韩撰”，收录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组织策划编纂的《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三十八册中。

从绿林好汉到八路军传奇司令 (下)

——记刘海涛

王卫东 王欣

1938年上半年，刘海涛在苏联列宁格勒步兵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回到了延安。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军旅生涯意义重大。

奔赴山东抗日战场

为了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1938年8月，中央陆续派张经武、江华等红军干部以及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抗大和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共160余人到山东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总队。张经武、黎玉分别任指挥和政委，吴克华、刘海涛、李林任司令部科长。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进行了勉励，使刘海涛深受教育和鼓舞。

8月21日，这支队伍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太行、冀南于11月初抵达山东泰西大峰山，刘海涛等八人留在泰西工作。泰西的东阿是刘海涛的故乡，回到了阔别12年的家乡，他感到无比的兴奋，然而他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他又无比愤怒，他指天发誓：如果不把日寇赶出家园、国土，他宁愿战死在沙场。

11月26日，根据上级指示，共产党领导的泰西地区抗日武装集结于大峰区黄崖村，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支队下辖4个团，1个特务营，3个独立营及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任仲夷，全支队4000余人。

六支队成立后，分四路展开了敌后游击战，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泰安第二区区长薛家俊投靠日军后，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刘海涛令一团一部与独立营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围歼第二区部薛家岭，活捉了薛家俊等30余人，缴枪50余支。然后张贴布告，历述薛家俊罪状，将其就地处决。

群众闻讯后，拍手叫好，奔走相告：“东阿县张集村老刘家的小子刘保仁（刘海涛原名）回来了，当了八路军的大官，领着队伍专杀鬼子汉奸。”一传十，十传



张经武（后排中）和徐斌洲（前排左起）、刘静海、华楠等一行赴山东路上

百，广泛传播，扩大了六支队在群众中的影响，振奋了泰西人民的抗日信心。

据他的老战友讲：刘海涛善于做群众工作，非常尊重地方干部。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主动找地方干部了解情况，商量研究问题，和地方干部关系处的非常融洽和谐。翌年1月23日，刘海涛率二团通过地方干部发动数千民众，在东阿至平阴的公路沿线，向敌展开了“破路大战”，一夜之间破坏敌公路百余里，使日伪机械化“讨伐队”陷入瘫痪。驻东阿平阴之敌骑兵闻讯后向我军出击，遭到我二团伏击，毙敌骑兵30余人，敌狼狈逃回县城。

是年春，东阿县委侦查到，东阿县维持会会长汉奸秦本端偷偷溜回老家，刘海涛命特务营一位副连长率一个排，在当天深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秦本端的住宅，将其抓获并就地枪决。汉奸们胆战心惊，打击和震慑了敌伪势力。

敌连遭我军打击后，向我军进行报复。1939年3月间，肥城、东阿之敌5000余人，企图将我军消灭在林马庄及常庄。刘海涛接到密报后，于当夜秘密地把部队转移到牛家庄、黄土岭一带山区。6日，敌东西继进，在牛家庄遭到我主力部队伏击，敌伤亡大半，余者狼狈逃回王庄。当夜，刘海涛率部又突然偷袭了王庄，歼敌400余人，从而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

他是刺向敌人的一把利剑

此战后，刘海涛被调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任参谋处长，7月又调第一军区任司令员，政委林浩、政治部主任刘其人。1940年2月第一军区机关编为第九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刘其人任政委。他无论调到哪里，都是人民军队的一把利剑。刘海涛在九年的抗战中（不包括在苏联学习两年），从白山黑水到齐鲁大地，身经百战，竟神奇般的未负过伤，难怪人们称他为“传奇司令”。

他的老战友，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其人，在访谈录中曾饱含深情地说：“我和刘海涛相处不到两年，他最大的特点是：执行上级命令坚决，打仗积极、主动灵活，而且很勇敢，打仗从来和战士站在一条线上，他随身携带三种武器，一把德造大镜面匣子枪，一支步枪，一挺轻机关枪，让警卫员们背着或扛着。冲锋陷阵从来在前头，他的枪法极准，在200米远的山头，敌人冲锋，他用步枪射

击，专打敌人脑壳，打得真准，百发百中。”刘海涛有一套独特的带兵风格，他是司令员，但很少蹲在司令部，总是深入基层往连队钻抓经验，哪里枪响，哪里紧要就往哪里去。晚上行军遇敌情严重时，他让副司令员殿后，让警卫员扛着机枪和他一起跟在尖兵班的后边，目的是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敌情，指挥部队快速投入战斗。他指挥部队作战，一是出手快，二是出手狠。

当时滨海区有个国民党的莒县县长许树声，有3000多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许树声这个反共的顽固派更加嚣张，经常侵犯我根据地，收缴我地方武装，抢劫老百姓财物。为了教训一下这个走火入魔的摩擦“专家”，刘海涛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向许树声这个反共的顽固派“亮剑”。

刘海涛指挥九支队及地方武装一部，于5月25日在莒南县的梁家屯、莲子坡等地向敌发起攻击，在我猛烈炮火的打击下，敌人开始崩溃逃跑，刘海涛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展开了一场百里追击战。战士们在冲锋号声的激励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高喊着：杀！杀！杀！猛打猛追，追杀得敌人丢盔卸甲，屁滚尿流。这次追击战歼敌一个团，许树声仅率数十人逃往莒北。

正在这时，临沂城的鬼子兵出动了，企图从正面和侧翼袭击我军，截断我军后路。刘海涛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退到北面一个山口，鬼子骑兵从侧面插了过来。两军相遇，勇者胜。刘海涛指挥部队迅速向东山一带靠拢，抢占了阻击敌人的有利地形，他抱着机枪向鬼子的骑兵射击，打得鬼子人仰马翻。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打退了鬼子骑兵的进攻，掩护部队从东南边安全地撤了出来。

6月末，刘海涛、刘其人以及五地委书记高克亭等指挥精兵千余人，由莒南县草岭石村，越过莒（县）日（照）公路，突然进入石门一带，给予屡次侵犯我莒日边抗日根据地、杀害我抗日民众的万仙会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并将其驱逐出我抗日根据地。不久，他们又率部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反击驻日照之间的国民党顽固派李延修部，一举歼其大部，李率残部逃往日照望海寺。这些战斗沉重地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扩大了莒日边抗日根据地。

由于刘海涛在抗战中屡建功勋，在8月9日召开的山东纵队党代会上，被选为山东纵队党务委员。

9月部队改编，二、九支队及一支队二团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孙继先任旅长，刘海涛任副旅长，下辖四个团。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1941年1月6日，孙继先和刘海涛等指挥二旅在长达十华里的战线上，对赣榆县伪保安旅发起攻击，伪保安旅溃败。3月19日，一一五师教二旅二个团和刘海涛指挥的山纵二旅一部，发起青口战役。激战6天，连克海头、大沟等十余处敌据点，毙伤日伪军800余人（大部为日军），俘伪军8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打通了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为了报复，日军4000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扫荡”，日伪在临沂、费县以北地区，设了17个据点，构成横贯东西的三道封锁线，切断了鲁中与鲁南的联系。为此，山纵一旅一部与刘海涛率二旅一部，于3月22日发起反封锁战役，激战4天，连续作战28次，毙伤日伪军371人，俘伪军426人，缴获大批武器，破坏公路150余里，桥梁20余座，拔除敌据点17个，彻底摧毁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6月15日，刘海涛率二旅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临沂、枣庄公路伏击了日军汽车队，激战3小时，歼敌大部，击毁敌汽车13辆，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

8月30日，他又率二旅一部在赣榆县兴庄抗击由该县及青口镇进犯之敌600余人，经激战毙伤敌100余人，给进犯之敌以重创。

血洒沂蒙山川大地

1941年9月，山纵决定成立鲁中军区，统一指挥泰山区和沂蒙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任命刘海涛为司令员，鲁中区委书记霍士廉兼政委。鲁中军区所辖的沂蒙地区是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和驻军所在地。鲁中军区机关尚未组建，即投入到了冬季反击日伪大“扫荡”。

11月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指挥日军第十七、二十一、十二师团大部和独立混成旅一、六、七、十旅团及伪军5万余人，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起了铁壁合围的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驻沂蒙山区主力部队。于是我沂蒙山区党政军民与日伪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合围。但在这场惨烈地反扫荡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血洒沂蒙山川大地。

刘海涛带领警卫排和青年营在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于岸堤以北王山一带。为了保存实力，他命令警卫排和青年营分头突出了重围，自己和鲁中区社会部长朱毓淦等人转移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村。刘海涛刚到此地，对当地情况不熟，被阴险狡诈的汉奸石绍武（原系蒙阴县地主武装，投日后编为当地伪军）伪装成抗日联防大队将他们诱捕。

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他软硬不吃，敌人在这位宁可断头、决不屈膝的共产党人面前，无计可施。11月25日，刘海涛与妻子苏珍、朱毓淦等八人，在苏家村英勇就义，时年34岁，走完了他短暂辉煌的一生。

刘海涛结婚二年，没有留下子女，但他留给社会的是让后人无限敬仰的丰功伟绩、献身精神和优良传统。刘海涛在黑龙江生活战斗了十年，第二故乡的人民始终深爱着这位抗日英雄。1999年11月25日是刘海涛牺牲58周年，黑龙江省烈士纪念事业基金会和尚志市（原珠河县）人民政府在尚志市烈士陵园，赵尚志、赵一曼烈士纪念碑旁，为刘海涛烈士修建了纪念碑。让他们的英灵守望着祖国的美好家园，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成的抗联精神代代相传。



六支队司令员刘海涛在沂南县薄庄村的住房遗址

沂水县石栏村“双龙碑”的传说与真相

刘海洲

沂水县圈里镇石栏村保存着两通石碑，碑上都雕刻着双龙，龙首间刻着“救命”二字。关于这两通石碑的来历，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某年的一天，有个落魄青年来到这个村子。他疲惫不堪，饿极了，就向村人讨口饭吃。当时到处都是饥馑灾荒，谁家也没有能力接济别人。善良的村民张守佐看这个青年实在可怜，就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儿橡子面（灾荒时可以充饥），烱了个饼子给他吃了。落魄青年临别时对张守佐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时可按照这个地址去找我。”留下了张纸条就走了。张守佐不识字，把纸条随便往墙缝里一塞，没有在意。几年后他想起了这张纸条，找出来请识字的人一看，原来吃他橡子面饼子的竟然是当朝的崇祯皇帝！于是张守佐便到北京去找他的“朋友”。崇祯皇帝确实没有忘了那个橡子面黑饼子结下的深厚情谊，想好好地报答他，给他个官做做。但无奈张守佐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既看不了公文，也写不了奏章。皇帝没办法，只好叫他敲钟——每天上朝时敲一阵，散朝时再敲几下——他只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后来张守佐退休返回原籍，皇帝觉得没能让他享受到高级别的政治待遇，就赐个“双龙碑”以补上这个人情。

以上这个说法是2004年春村干部向一群参观者介绍的，笔者当时在场。村干部还说东西相距约50米的这两块双龙碑，一块是封给张守佐的，一块是封给他夫人的。但读者一旦读过碑文后，就会知道传说和事实真相有多么得遥远！张守佐不是文盲，也不是敲钟人；而这两通石碑也不是夫妻两人的，而是两代人的——一通是表彰张存信夫妇的，一通是表彰张守佐夫妇的！

笔者后来曾看到过一篇介绍石栏村双龙碑的文章，主要故事和当年村干部介绍的一样，但其他细节有些不同，是传说故事和碑文内容的一种嫁接。文章是这样介绍的：

明神宗皇帝封张存信做了撞钟大师（把敲钟人变成张守佐他爹了）后不久，神宗又派人把张存信一家老小全都接到了京城，并封张存信之子张守佐为征仕郎羽林左卫经历司经历。张氏父子感恩不尽，



自然在工作上恪守职责，任劳任怨，忠贞不二，为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皇上的安全多次舍生忘死，建立功勋。明天启七年，张存信病故，皇上下诏为其金顶玉葬，并准其回原籍，安葬在了石栏村村南。

明崇祯十年，张守佐告老还乡，皇上为表彰他在任职期间的功绩，也为了表彰他的妻子在他任职期间恪守妇道、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美德，特赐双龙碑两块，以男尊女卑之分分左右立于张存信墓南50米处。由京城当时的著名石匠李世贤篆刻，其两龙之间多有穿孔，相传非皇上救命不能如此；另有雕刻的石人、石马数件，在从京城运回石栏的途中因逢战乱而遗失。

这篇文章介绍的内容，尽管明确了张守佐在京工作的身份（左卫经历司经历），但还是把两通石碑的内容弄错了（误以为夫妻二人一人占有一通，村里有人读过碑文，但没有真正读明白）。

张守佐到底是怎样进京做官的？上面的传说故事和历史真相到底有多远的距离呢？笔者从碑文和史料进行考察，以揭开蒙盖在这两通双龙碑几个世纪的面纱。

从两通碑文上看，编号为“一百三十六号”碑是赐给张守佐夫妇的，编号为“一百三十七号”碑是赐给张守佐父母张存信夫妇的。因为张存信夫妇教子有方，皇帝也加封他们“徵仕馆羽林”和“太孺人”的封号。他们两代人之所以得到皇上的恩宠，是因为张守佐在锦衣卫供职，是“经历司经历”。

为查找张守佐其人的身份，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史籍，最终在清版《沂水县志》找到了这个人物。

《沂水县志》在卷四“科目·例贡”中载“张守佐【锦衣卫经历】”。不论是年代、姓名还是身份，碑文记载和清版《沂水县志》的记载完全吻合！“经历司”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主管锦衣卫公务文书的出入、誊写及档案封存等事项的部门。由此可知张守佐是锦衣卫的文职人员，并且是“例贡”出身。明清两代“贡生”中，有一种是捐资国子监买来的身份，在明代称“纳贡”，在清代才叫“例贡”。张守佐是明代人，应叫“纳贡”才对，清版县志在这一细节上显然是疏忽了。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张守佐花钱买了一个“贡生”的身份，由此进入皇帝亲自掌控的要害部门锦衣卫，并且在类似今天的“机要室”管理文件。崇祯皇帝居然在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还为他们敕封荣誉称号，这对张氏父子来说，实在是荣幸之至了！

碑文和清版县志记载是真实的历史，而石栏村历代村民关于双龙碑的传说，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杜撰了。双龙碑立后仅8年，大明江山已变成大清的天下，作为给明朝效过力的张守佐，在改朝换代后没有人再敢提起。后来村民看不懂碑文，不知道张守佐的真实身份和双龙碑的来历，于是就杜撰了这么一个带有戏剧性的传说。传说又是如此美丽，于是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石栏村世代代流传的双龙碑来历的故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讲起的？为什么不顾碑文的真实记录，而肆意编造这么一个无稽之谈的谎言呢？张守佐能花钱捐为贡生，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他是读过书的，且热衷于功名，二是他的家庭是富裕的，能拿出一定数额的银子来，这样的人家在村里甚至在周边地区应该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由此可见，村民流传的故事是张存信夫妇死去很多年，后人早已忘记了张守佐当官的缘由之后才出现的。那么，碑文一直存在着，为什么传说故事叙述的内容完全不顾碑文的记载呢？也许是后来村民中一直没有能够看懂碑文的人，也许是他们完全看懂了，但是，这个虚假的传说太可爱了，这个行善就有好报（施舍了卷子面饼子能得到皇帝的奖赏）的故事符合历代“劝善”的社会主流文化，于是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由此看来，传说只能是传说而已，如果把传说当成历史真实，那就大错特错了！

下面两段话，也是那篇文章介绍的：

石栏村自从立了双龙碑，前来观瞻者络绎不绝。清同治十年，张氏后人为给双龙碑增光添彩做了三件事，一是沿双龙碑东西横向植柏树30棵，可惜的是这些树1973年被砍伐了；二是在村东建起了72蹬台阶，这是为了营造一种气势，让参观者进村就对双龙碑产生敬畏之情；三是在72蹬台阶北侧由族人张树森、张树升兄弟二人植下银杏树一棵。此树至今已有130余年的历史，其生长仍然相当旺盛，每到秋天都会硕果累累。

1972年，有村民二人从墓中挖出铜镜两面，石砚两块，其中一面铜镜已交县博物馆收藏，其余三件丢失。1991年，又有村民从墓中挖出铜人一个（高约十厘米，重约0.25公斤）和盔甲装饰金属珠子一个（直径约1.5厘米，上有花纹），这两件文物被一小贩买走，作价仅为250元。

以上两节文字内容是真是假，没有考证的必要，因为距离现在时间短，应该是真实的，起码那棵粗大的银杏树还挺立在那里。2004年夏，我们一行参观时，县里的老领导建议村干部在银杏树四周垒个圆台子，填土加以保护，因为银杏树在斜坡上，众多的树根都被雨水冲出来了。2014年秋，笔者陪友人去石栏村看双龙碑时，见两通石碑已经从村南的田野里移到了村里，并砌了围墙加以保护。2004年县老领导的建议垒堰填土以保护古银杏树之事，后来也得到了落实。看来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附录两通碑文：

其一（赐张守佐夫妇）：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朕求治甚殷，勤劳着绩者必显褒之，况畿辅之地，羽林实称重任，所望赞襄之力尤多也。尔羽林左卫经历司经历张守佐，家绍诗书，世传清白，莲池振秀清风，兼有长才，戎幕筹□宏略，骋其长驾，致精诚于雉堞，录勋绩于简书，恪守三年，贤腾众口，用授尔征仕郎锡之，救命益懋乃绩，以需效用。钦哉。

敕曰：夫从夫贵，岂不以内德之于官方，有赞襄之力欤？贤有可风，褒宜及矣。尔羽林左卫经历司经历张守佐妻李氏，德则徽□，性惟淑慎，调甘涤苦，事姑以诚，解赠傲兴，相夫以道，即兹□范之端式，显臣贞之励是，用封尔为孺人，承华象服，益警鸡鸣。

救命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百三十六号

其二（赐张守佐之父张存信夫妇）：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国家创制，显实追崇之典与式序并行，所有教孝而劝忠也。张存信乃羽林左卫经历司经历守佐之父，诚笃性资，汪涇襟度，黜浮崇雅，力挽习俗之趋，身隐行而恬养丘园之乐。乡闾垂范，委巷称仁。即尔子莲幕成劳，见当年义方，夙教是用，赠尔为徵仕馆羽林、左卫经历司经历，永贲泉壤之光，式焕纶綍之色。

敕曰：从来用世之贤，育宝有自明乎？母仪之重国家胥赖矣！尔黄氏，乃羽林左卫经历司经历张守佐之母，含章琼璞，表度山河，用身仪克谨于视星，妇道□守乎？爰日辟纁守俭教任忝戎，是用封尔为太孺人，赐以从子之荣，以为太母者劝。

敕令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百三十七号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四)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出访韩国

1995年深秋的一天，临沂画院院长皮之先应韩国华侨联合会邀请，率领高庆荣、马约、徐敏生、孙振国、李大坤等书画家出访韩国。他们从威海乘客轮，经一夜航程达仁川，再乘车抵达目的地汉城（后改名为首尔）。

韩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是华裔山东人，不仅是位商界大老板，还是一位爱国人士。当年台湾当局的大使在撤走时，企图卖掉大使馆，是他带领着华侨极力反对，终于保住了使馆。这次出访活动，是由他牵线搭桥，他联系选定了文化交流的对象——韩国一流的书法家，并提供了经费，选派了优秀的翻译。访问团到达后，华联安排他们下榻汉城最高档的五星级宾馆——汉城大



在韩国书法家金膺显（右）家中做客

饭店，这里设备豪华，食宿舒适，给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虽然访问的日程只有10天，但安排得十分充实而有意义。首先是访问韩国书法泰斗金膺显。金膺显（1927—2007年），是当代韩国书坛巨匠、元老书家。他生于汉城，字善卿，号如初。1938年毕业于东国大学专门部文科，自1956年以来，先后担任弘益大学美术学部讲师、成均馆大学讲师、韩国东方研究会会长，1976年2月被授予中国书协名誉会员，1991年加入中国西泠印社，1997年获得了韩国宝冠文化勋章。

金膺显不仅书法造诣很高，而且热心于中韩文化交流，他积极提倡并参与和中国书法界进行交流。他曾到山东大学举行“书法讲演会”，举办书展，与山大著名书法家蒋维崧作深入研讨，并参加在山东举行的“中国秦代刻石书学研讨会”“中国北朝摩崖刻经书学讨论会”等。他曾和启功一起在北京、汉城举行“书法联展”，也曾经应我国邀请多次参与中国兰亭书法节，在右军祠挥毫留下许多墨宝，在曲水流觞处，与中国书法家饮酒赋诗，交流书艺。

访问团在翻译的陪同下，到“金膺显艺术馆”去访问金先生。此馆在汉城市中区，是一座三层韩式建筑的楼房。有金先生的画室、展厅，也有起居室和客厅。金先生听说是来自书圣王羲之故里的书画家，一直迎到门口鞠躬表示欢迎。客人在金先生的陪同下先参观了二、三楼的书法篆刻展。这里展示了上百件精品力作。参观者都为金先生深厚的功力和诸体皆能的全面修养所折服。最引人瞩目的是魏碑之作，据介绍作者对魏碑有精心研究，其风格碑味浓厚，既有传统功底，虽然是古典式的，但它既要在现代社会生存，它必须像其他艺术一样，为表达艺术家主体感情，提供相应的形式。在对书法经典的了解上，日本与中国还是有差别的，日本人不是十分了解古代中国书法经典的，比如说日本人写的隶书和颜体字是比较差的，不符合法度。韩国人写的隶书和颜体字没有像日本人写的那么差，但也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

离别时，金先生将两本《金膺显书法集》赠给客人。为什么没有回赠书法原作，翻译这样解释：金先生是书法泰斗，其书作被当作国宝，是不允许带出国门的。

韩国的另一位书法家金仁奎，因为来过临沂，并与部分书法家有交往，听说老朋友来韩，主动到大饭店去拜访。金仁奎，1927年生，汉城大学教授。因为崇拜王羲之，曾来过书圣故里临沂，参加过书画大奖赛和文化节，与书法家惠玉昆、徐敏生、高庆荣等都有书艺交流。他编的书法集，不仅收录韩国的作品，也收录临沂书画家的作品。他的书法被刻入王羲之故居碑林，是入碑林少有的一位外国书法家。

他热情地请代表团到有中国料理的饭店吃饭。韩国的饮食为生、辣、海、腌为主，杂以烧烤，主食为米饭，这很不适合中国北方人的口味。之先等人吃了几天就倒了胃口，渴望吃一顿以面食为主的中餐。金教授请客，满足了大家的食欲。就餐时，每位客人给一个垫子，需席地而坐，上饭菜时由服务员用食盒提来。这些异域习俗，使人感到十分新奇。

搞书画的人，莫不对笔墨纸砚感兴趣。来到韩国，自然想看看“文房四宝”，皮院长一提议，大家一致响应。于是，由翻译导游，来到了位于钟路区的仁寺洞大街。这里有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韩纸专卖店，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专营传统韩纸。货架上摆满了色彩各异、用椿树皮为原料制成的韩纸。这是一种吸水性、光泽、韧度都很好的纸。由于其制作精密，成品优良，现今已列为韩国的文化遗产了。

这条街最具传统风格，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气息。周边的小巷隐藏着令人惊喜的



小店铺，经营古字画、古代美术品和现代工艺品，是淘宝人喜欢光顾的地方。这里开设许多画廊，里面既有名家代表之作（书法多写唐诗宋词，画多为花鸟），也有新人的独特画卷。古代朝鲜的水墨画清秀淡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各种现代风格的作品，又有鲜明的个性，颇受青年人青睐。据介绍说，这里画廊经常举办各种展览会，因此成为韩国艺术家交流的好地方。漫步仁寺洞大街，仿佛回到100多年前李朝的街巷之中。

为了感受韩国各方面的生活，访问团分别用一天游儿童游乐园，逛百货商店。儿童游乐园规模很大，设施齐全，百货商店商品非常齐全。这些都令观者惊叹。韩国经济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夜幕降临后，访问团来到汉城大剧院看演出。这天演出的节目有中国杂技、美国和俄国的歌舞，演完需要一个通宵。韩国人喜欢这样通宵达旦的夜生活，中国人乍去还享受不了。

皮之先等人这次访韩，对于加深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书画艺术的发展都起很大作用。正如金仁奎教授所说：书圣故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这里的书画家都是我终生难忘的好友。

（感谢徐敏生、马约、高庆荣、孙振国等人提供资料）

打散场

刘振本

打散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沂蒙北部山区的一种地方风俗。就是每到秋后，地里的各项农活拾掇完，大约在过了农历的立冬到小雪前后，生产队长便召集全小队的劳动力聚一次餐，俗称“打散场”。

那时候一个生产小队也就20户左右人家，有二三十个劳动力，全小队百来口人。当时主要是农业生产，地里的最后一项农活就是拔棉花棵。干完这项农活，就没有事干了，所以有句俗语：“拔了棉花柴，明年再另来”。“再另来”这三个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现任生产队长任期到了，那时的生产队长是每年一选举。干到年尾，不管新选还是连任，都要进行重新选举；二是不管谁干生产队长，全年的农活安排都得需要重新合计打算和安排。打散场这个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再另来”的预热过程。因为现任的生产队长不管干得好不好，都要和大家见个面，有个交待；同时还可以评价一下当年的成绩和不足，为明年新任生产队长提供生产计划参考依据。

参加打散场的主要是平时能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聚餐的内容都是固定的：大锅山羊肉熬豆腐和萝卜，地瓜干酒。这件事一般提前半个月就得筹划张罗，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群山羊，多的百十来只，少的也有五六十只，由一个专人放养。打散场时便从羊群中挑选两只体大膘肥的杀掉。做豆腐的豆子和萝卜，那时是集体种，平均分，这两样东西不成问题。地瓜干酒用生产队的地瓜干到供销社去换。选择一个天气晴好暖和的日子，找两口大锅，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支起来，再找几个地八仙饭桌和长条凳。几个有做菜专长的人忙活一天，到晚上集体收工回来，每人回家拿一副碗筷，便到场上聚餐。灶炉里柴干火旺，大锅里肉菜翻滚，香味在老远处都能闻到。有时几个生产队在一天晚上同时搞。每到这时，周围邻近的妇女们都看紧自家的孩子，生怕他们到那里去眼馋，惹人笑话。聚餐时往往是“人以群分”，老农把式们坐一桌，男青年和姑娘们各坐一桌，图的是说话方便。生产队长负责掌勺，每个桌盛上一大盆，然后再由自己盛到小碗里，大吃二喝。女劳动力的桌上一般不喝酒，怕人笑话，她们只管吃菜喝汤。

聚餐中，老农把式们边喝酒边数算着当年的收成和经验教训，哪块地里适合种什么，不适合种什么，明年应当怎么办。男青年们在一起打打闹闹，姑娘们便盘算冬天干点什么，到过年时添件什么样的衣裳……其浓浓乡情弥漫全



场，沁人肺腑。那时正值“文革”期间，有一回男青年桌上争论起运动的事儿，队长听到后以绝对的权威大声正言道：“今日是打散场，老少爷们一年到头不容易，只啦家常，不啦别的！”那桌上便鸦雀无声。批评归批评，队长还是对男青年们爱护有加，有时端着酒到桌上坐一坐，甚至拿起盆到锅里捞些肉回来，因为一个百十口人的生产队里，男青年劳力顶多也就七八个人，平时重活累活还得靠他们，队长钟爱之心溢于言表。

有时也闹出一些笑话。大锅里往往是豆腐萝卜先熟，和一些肥肉膘子飘在锅上面，而带骨头的肉沉在锅底，队长第一圈先盛已经熟了的豆腐萝卜和肥肉膘子。那时候极端贫穷，一年到头吃不到几回肉，姑娘们经不住肉锅里香味的诱惑，便放开大吃大喝起来，而老农们则慢腾腾地品酒说话，等到肉熟骨烂盛上来时，姑娘们已经吃得菜足饭饱了，看到老农们盆里净是瘦肉，直喊上当，说还是年纪大的心眼儿多。可是说归说，就是免不了年年上当。

打散场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队长一定要把羊肝留出来，专门送给队里当年出生的孩子，叫做“膻肠子”。据说如果新生的孩子不喂他羊肝，长大后他就不吃羊肉。队里有几个孩子出生，不管是年初生的还是年尾生的，有几个就分成几份，让家长带回去喂孩子。那时什么事都讲究个平均，唯独这件事没人攀比。这在当时只认为是风俗，现在想起来，不仅是一份敦厚纯朴的浓情，同时也有深刻的养生知识在里边，因为新生儿最缺的是多维生素，而动物肝脏正是极好的补充。

我在老家参加过二三次打散场，出来上学后就中断了。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听说我们生产队最后一次打散场，支了四口锅，杀了四只羊，连老婆孩子都叫去了。生产队长说：“羊是集体的，也是大伙的，分也是分，吃了也是分，就权当大伙子在一块过个节令吧！”

农村改革后，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被打破，打散场这个风俗也就永远地消失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是深重的记忆和怀念，不仅是那个年代饥饿贫困时的一顿美味饱餐，更重要的是那一抹永远也无法忘却的浓浓乡情。

峰县南塘村

本 编



1938年3月初，郭子化、张光中通过统战关系，从国民党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争取到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公开在沛县、滕县、峰县等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5月19日，徐州失守。中共鲁苏豫皖边区特委立即调集沛县、滕县、峰县等地抗日武装，在滕费峰边界的南塘、凤凰庄、善固一带会师。5月21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老古泉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苏鲁抗日义勇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韩文一任参谋长，王见新任政治部主任。总队下辖3个大队和1个直属宣传队，共600余人。抗日义勇总队成立后，依靠临郯费峰边山区，开辟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郝荣贵：他打死了刘黑七

高雷

郝荣贵与何万祥、鄢思甲一样都是八路军山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他们是组织推荐、民主评选出来的金牌抗战英雄，历史的星空中有他们闪烁的光彩。

本期刊登的郝荣贵素材主要来源于1944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的采访。其中一些时间、地点、情节与以后许多回忆录、文章不尽相同，本文未做改动。

郝荣贵原名何荣贵，今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何家庄村人。1924年农历四月十三出生于农民家庭。排行第三，兄弟五个只有何荣贵上了小学，读了不足4年，便辍学回家干活，年龄稍大后，便帮助父亲料理家务，维持家庭生计。1940年5月参加八路军后更名郝荣贵。

——题记

郝荣贵是山东八路军中的普通一兵，四年军旅，默默无闻，一举成名，源于他打死了巨匪刘桂堂。谈郝荣贵要先介绍一下刘桂堂。

刘桂堂，山东费县锅泉村人(今属平邑县铜石镇南锅泉村)。幼年时生活清贫，从12岁起，给地主放羊。1915年他23岁时，与当地社会青年共8人结拜为把兄弟。因排行第七，其面目黝黑，被人称做“刘黑七”。

后为活命，刘黑七干起了剪径的勾当，曾参加了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事后孙美瑶受招安被杀，刘黑七收容被遣散的匪众千人，起初在抱犊崮山区周围为匪，打家劫舍，后滚雪球般地向北方辐射。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刘黑七部时聚时散，盛时达3万之众，流窜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河北、天津、山西、吉林、辽宁、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十几个省市。所到之处，血洗村庄，杀人如麻，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剿灭无方，养虎为患，使其得以坐大，成了闻名全国的混世魔王，其为害29年之久。屠杀百姓多达20余万人，其杀人手段之残，聚集匪徒之多，活动范围之广，怙恶时间之长，可谓全国匪首之冠。

兔子不吃窝边草。刘黑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草”都吃，家乡沂蒙山区是他祸害的重灾区。有人统计，从1925年至1928年，四年内，仅山东沂蒙山区，即有千余个村庄遭到刘匪的抢掠，房屋被烧20多万间，12000余人被残杀，奸淫妇女无算。

刘黑七第二个特点是“有奶便是娘”。为此朝三暮四，今天打着西北军的旗号，明天扛着东北军的招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充当过日军侵入山东的带路人，任皇协军的前进“总司令”，他反水后担任过国民党鲁苏战区暂编三十六师师长。为了抗日，他与八路军建有过联系，反目后，经常袭击

八路军，残杀抗日民众。1940年春，刘黑七率众偷袭驻山东平邑柘沟的我八路军某部三团，致使三团团团长续志先以下200余人遇难。刘黑七人熟、地熟、心狠手辣、反共坚决，盘踞抱犊崮山区，成为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心腹大患。人民群众对其既恨又怕。刘黑七一日不除，鲁南的局面一天打不开。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多次寻找机会，对其进行彻底的清除，均被他侥幸逃脱。至1943年秋，刘部遭我几次打击后，残剩1000余人，龟缩柱子山下的上柱子村、下柱子村、刘庄三地。11月份，鲁南军区为配合鲁中区反“扫荡”，决定发起围歼刘桂堂部战斗。战斗开始前，罗荣桓又向鲁南军区负责人张光中、王麓水交代：“刘黑七过去多次被打垮又重新拉起队伍。这次一定要活捉他，没有活的，死的也行！”

根据刘部的兵力部署及行动规律，鲁南军区的作战方案是，由鲁南军区五团一部阻止梁邱敌人的增援，一部包围刘庄；鲁南军区三团主攻上柱子，并以一个连看守下柱子。战斗的信号是在刘庄的后山燃起一把火，时间是晚7点15分。

郝荣贵时任鲁南军区三团二营四连通讯员，他16岁参加八路军，在临费边反扫荡战斗中，右手的小拇指和无名指被打掉了，坚定、倔犟的他没有哭，调皮地说：“唉！拉枪栓的三个留下了，正好。”郝荣贵就是这么个人，能吃苦，爱打仗，当从首长的嘴里听到要端掉刘黑七的老巢，他兴奋地不得了，提前做好了各种战斗准备。

1943年11月11日，一个深秋的夜晚，田净场光，月高气爽。下午5时，团首长一声命令，部队从泗彦一带出发。为了迷惑敌人，部队未直奔柱子村，而是绕崎岖小路向梁邱以东行进，然后向西折回，直扑上、下柱子村及刘庄。

7点15分，鲁南军区三团的五个连及其他部队共12个连向刘黑七发起总攻。晚九时许，“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围墙被炸开，指挥员一挥手，战士们乘着滚滚浓烟，喊杀声震天，冲入围里，刘黑七所在东柱子村防线被我主攻部队突破。

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锅粥，庄东、北、东北外围的几个碉堡起火了，大火映红了这个山窝里的小村庄。指战员在村里搜索前进，打通房屋，挖抢眼，准备夺取小围子里的大炮楼，活捉刘黑七。

四连的任务是警戒，他们埋伏在村子的西南角，既打援又可消灭突围逃窜的敌人。消灭了第一批“出水”的敌人后，他们继续隐蔽在一片坟地里。战场突然沉寂了。郝荣贵趴在指导员的身边，透过松荫的缝隙，借着月光，目不转睛地盯着黑黝黝的围墙。坟地里老柞树在风中摇曳着稀疏的枝干着，哗哗作响，不时地飘落下来几片黄叶，落在郝荣贵的身上、脸上，他揉一揉眼皮，驱除着疲劳和睡意。初冬的夜晚，满身的汗水被凉风拂过，脊梁上像披了一层冷露。他蜷曲在枯草中，感觉到左脚的疼痛和发热，他伸手摸了过去，脚脖子上一个柿子大小的大疙瘩，唉！偏不凑巧，战斗中送信把脚崴了，他痛恨自己无能，还不敢告诉首长，这会让他退出战斗的。能够参加消灭刘黑七的战斗，对他来说是无限的荣光和期盼，他咬牙坚持、忍受着。

围墙出现了石块滑落的声音，郝荣贵警惕地睁大了眼睛，有黑影在蠕动，转眼间就消失了。他攥紧了枪，把头伸了出来。指导员也感到纳闷，向前挪了挪位置。

突然，手榴弹和枪声响成了一片，大炮楼的外墙上迸发出朵朵火花，许多人在呐喊：“捉活的！……别让刘黑七跑了！……冲啊！”

这时，阴影里黑影又显现了出来，一阵跑步声，来了，两个？不，是三个。郝荣贵看得清楚，一个高个子，两个矮矮的，他急促地叫了出来：“指导员！”

“追！”指导员第一个跃起，追了出去。郝荣贵紧随其后。

坟地里响了一枪，高个子摇摇晃晃倒在了前面，两个矮的向不同方向逃窜，郝



1945年12月，
八路军鲁南军区郝
荣贵所在连在攻破
的山东滕县城东门
前留影。

荣贵与指导员每人粘住了一个，穷追不舍。山地起起伏伏，高洼不平，他的脚由疼痛变为麻木，另一只脚开始吃力了。信念支持着他不能停住脚步：“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敌人不能放跑。”

黑影子忽而左、忽而右，有时还故意不在小路上走，佯装要上山，其实在转圈。郝荣贵一颠一歪，一歪一颠，眼睛紧盯着黑影。黑影蹦跳上了地堰子，一个趔趄，好像摔了一跤，弯着腰，减缓了脚步。郝荣贵想：“敌人累了，准备缴他的枪。”

转念之间，黑影猛地一个转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迎面打来，郝荣贵已无法止住脚步，东西砸到了他的左臂，“哗啦”碰撞到枪托，落在地上。他想：“我不能吃闷亏，得还给你。”一摸，是块冰冷的石头。他判断：“敌人没子弹了。再仔细一瞧，黑影穿着一身便服。这是个官，一定捉活的。”

他爬上了地堰，朦胧中是一片刨完的地瓜地，土质很松，不但陷脚，土堆还绊人，郝荣贵汗水顺着鼻子淌到嘴里，苦咸。

黑影子也累熊了，脚步不稳，摇摇摆摆地爬上了第二个地堰子，郝荣贵喘口气的功夫，就不见了人影，郝荣贵琢磨：“坏了，让他跑了？”他站在地堰下，瞪大眼睛，仔细过滤着每一处高凸顶，黑影子忽地在他的不远处站起身来，嘴里喘着粗气，双手抱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砸向郝荣贵的胸脯，虽没有伤到他，却把他吓得不轻。距离太近，这次让郝荣贵看了个清楚，大肚子，大脑袋，活像一条老黑牛。他立刻联想到指导员在动员会上讲的：“矮，胖，腿短腰粗，头大脸黑的那个人，就是刘黑七。”

郝荣贵心想：“这可能是他吧？死活都行，不能叫他跑了。”劲头来了，他跃上了第二道地堰子。这时候，他与黑影子是脚赶脚了，两人都在拼命地跑，比的是斗志，比的是毅力。黑影子翻上了第三道地堰子，郝荣贵从旁边绕过去的时候，黑影子窜出了约二三十米，郝荣贵伸手掏向子弹袋，扣得太紧，子弹没能掏出来，他深知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了，慢慢举起枪，屏住了呼吸。

黑胖子转过身来，又要重复以往的动作。郝荣贵扣动了扳机，“乒”的一枪打了过去，黑胖子直接跌倒在那里。郝荣贵跑到跟前弯腰一看，大黑南瓜似得脑袋上穿了一个洞。后来他回忆说：“真胖，腰像水缸那么粗，穿一身漆黑、发亮的绸子夹衣裳，一摸溜滑细软；抓在手里一大把，一松‘忽闪’一大堆；灰袜子，千层底

鞋，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卷手纸。”

指导员逮着的另一个黑影子，也被押了过来，俘虏愣愣地站在小胖子的尸首旁，嘟囔着：“他就是刘司令！不，不，刘黑七。”

战友们、支前的民工纷纷围拢过来探个究竟。

郝荣贵这时才感到自己不仅脚痛，左臂也痛，他解开绑带，腿也肿了一大片，再加上刚才的疲惫，瘫坐在了那里。抬担架的民兵们劝他上担架，他拒绝着，民兵说：“你打死的是真是刘黑七，就立了大功，莫说坐担架，坐八人大轿也是应该的。”说着就把他推了上去。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战士们奔走相告：“郝荣贵打死了刘黑七！”“刘黑七死了，快缴枪吧！”柱子山前一片沸腾。

营长来了，军区政委王麓水来了，郝荣贵就要向首长请罪，没有抓到活的嘛！首长当场宣布要给他记特等功，并告诉他，一定要派他去参加山东军区即将召开的战斗英雄大会。王麓水向他说：“郝荣贵同志，你为鲁南人民除了大害。从此，鲁南人民就要挺起腰杆来了！”

几声零碎的枪声驱走了黑夜，天明了。老百姓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听着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扇一扇的门打开了，饱受刘黑七蹂躏的乡亲们走到了街上，拉住八路军战士的手，询问打听，“真的吗？”“你们可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啊！”

围子外，人们越聚越多。他们并不是在那里想分刘黑七的财物，而是在计议怎样处置刘黑七尸体，来解心头之恨。鲁南其他各县的人都要把他弄走，而费县各区甚至各村又都想把他弄回自己那里去，让受害的人看看；还有人主张就地刀割，一个村带一片肉回去；也有人主张点他的天灯，但马上就有人反对，说点天灯倒便宜了他。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抬着死尸一村一村地游。一个大娘像着了魔似地找到首长说：“同志，告诉他们，晚上要把那黑杀的吊在树上，免得野狗吃了，别人报不成仇。”

郝荣贵打死了刘黑七的故事，风快地到处流传，鲁南八路军走到哪儿，哪儿就会聚集一堆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想看看英雄郝荣贵的模样。

春天，郝荣贵的老父亲在家乡莱阳县得到了这个喜讯，长途跋涉几百里，赶到了鲁南山区，他要亲眼见一下自己阔别了四年的儿子，是什么精神把他教育的如此无畏，是什么力量把他培养的如此强大，为百姓除妖灭害。

在抱犊崮山区，老人家找到了一群挥舞着镢头开荒的八路军，他告诉指导员他是郝荣贵的父亲，一会儿，指导员领来了一位青年八路，除了鼻子眼睛还有离家时的模样，个子长高了，人也魁梧了，老人家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只是问了一句：“是你打死的刘黑七吗？”郝荣贵羞涩的点了点头。

1944年8月，郝荣贵参加了山东军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被评选为山东军区一级战斗英雄。

解放战争时期，郝荣贵所在部队编成为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二十二团，“七月分兵”后，郝荣贵任二十二团三营副营长，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一路打向鲁西南，打得艰巨，打得勇猛。九月初的一天，部队转移到巨野西北。经过一夜休息，部队正忙着布置当晚的行军工作，师部突然来了电话，通知今天不行动了。营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会。

一个在平时看来极其平常的通知，此刻却像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应。还在去师部的路上，郝荣贵就憋不住凑到团长毕庆堂跟前神秘地说：

“团长，不走了，又开会，我看部队又要打仗了！”果然，被这个小伙子猜中了。

会议传达了兵团的部署，实施沙土集战役，三纵负责东北面，二十二团担任主攻，从北门突破；二十四团突击东北角，兄弟部队六纵、八纵从西北和南面攻击。

接受了任务，全团的干部都高兴得跳起来。郝荣贵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更是高兴，一路上都吵着闹着向团长要任务。

二十二团开近沙土集的时候，兄弟部队经两昼夜战斗已扫清了外围据点，把国民党军五十七师团团围在沙土集村子里了。

9月7日黄昏，敌军最后一批飞机飞走了，沙土集上空刚刚罩上一抹暮色，村北的我军阵地上活跃起来，部队开始进入攻击位置。

二十二团前线指挥所刚设置完毕，三营就打来了电话。毕庆堂团长抓起听筒就听出是郝荣贵。他那尖利的嗓音甚至打电话时也流露出股愉快、调皮的劲头：“团长，我们向你报告战果……”

还没开始打，怎么就有了战果？原来，由于他们动作迅速、隐蔽，甚至守在圩外的敌人都没有发觉。九连的一个通信员摸黑闯到北门外的一个地堡跟前，见是敌人，毛手毛脚地喊了声“缴枪！”守敌一个班投降了。

毕庆堂表扬了他几句，接着嘱咐他：继续隐蔽，看好地形，作好准备，保持攻击的突然性。郝荣贵回答：“半个钟头以后看！首长等着胜利消息吧！”接着就到突击连去了。

九时十分，攻击开始了。

标志着攻击开始的那发白色信号弹的亮光还没有熄灭，村北门方向就传来了一声闷雷似的响声，第一包炸药响了。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连续四包炸药，北门炸开了！

几分钟后，三营九连已经突进北门，七、八连都跟进去了。

进路打开了，三营全营突进村里。三连也已突破了另一个缺口，一营拥进去了。这时，毕庆堂看看表，还差五分不到一个钟头。他命令参谋：“赶快叫二营火速进去，向纵深发展。指挥所往村里挪！”然后便抓起电话筒向师里报告。

毕庆堂进到村里，全团已经汇集在一起，正向村子中心进军。缴获也很可观，据报告已经缴到了美造榴弹炮四门，步兵炮两门。但是，巨大的胜利也正是优秀的指战员英勇牺牲换来的。

在激烈的白刃战中，郝荣贵身中三弹，倒在血泊中。牺牲前他还高喊：“我的人呢，给我打啊！”

几年来，郝荣贵从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鬼锻炼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与政治工作者，立过不少战功。就在这次战斗中，他亲带突击连，勇敢地突破了北门，为战役胜利打开了大门。

同志们痛心地沉默着。政治处的一个同志低声地问政委：“这个消息现在要不要向部队传？”

“要！马上传开去，号召为英雄复仇！”政委响亮地回答，“一个英雄倒下去，会有无数个英雄站出来的！”

“为战斗英雄郝荣贵同志报仇”的口号迅速传遍战场。英勇的战士们怀着复仇的怒火，更勇猛地向敌军纵深攻击。枪声响得更紧了。

沙土集战斗，仅仅经过四个半小时就胜利结束，敌军五十七师，从师长段霖茂、旅长罗觉元到伙夫马夫无一漏网，被干干净净地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郝荣贵烈士被掩埋在沙土集以北的赵庄村外，英雄与大地融合在了一起。

空谈误国属王衍

清风慕竹



王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清谈家。王衍天生一副名士的风采，他长相俊美，才华出众，外表安详文雅，又颇有风骨。14岁时，有一次在京城去拜访仆射羊祜，侃侃而谈，没有丝毫谦卑屈下的表情，让人看了都暗暗称奇。朝中权势最炙手可热的贵戚杨骏听说了，便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偏就看不上杨骏的为人，深以结交他这样的人为耻，就故意装疯，把这门亲事摆脱掉了。王衍的名声越传越远，最终传到了晋武帝的耳朵中，他就问身边的大臣王戎说：“王衍这个人在当今谁能和他比呢？”王戎回答说：“还没有看到过能和他相比较的人，能和他比较的，恐怕得从古人中去找。”说的武帝也禁不住神往起来。

王衍读书很多，喜欢高谈阔论，但从不谈钱，格外有一种高雅的名士味道。他的父亲曾任平北将军，颇有家财，借给亲朋好友的钱不在少数。他父亲死后，王衍把这些债务全部一笔勾销，不再索要。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皇后的亲戚，过不了穷日子，就借着皇后的势力，聚敛钱财，贪婪乖戾，从不知道满足。王衍憎恶郭氏的贪婪和浅薄，嘴里从不吐露出钱字，郭氏不信邪，就想试试他是不是装的。有一天，她让婢女用钱串子把床绕了起来，让他走不开，王衍早晨起来看见钱，大呼婢女，说：“把这东西拿掉！”始终没有说出一个

钱字。

爱说，又耻于言利，王衍擅长的是谈论治国安邦的大事，话匣子一打开，可谓博古通今，头头是道，听的人往往只剩下点头称是。公元272年，由于北部边境一直不安定，武帝下诏物色可以安边的奇才，负责人事工作的尚书卢钦，立刻捧月般推荐王衍做辽东太守。这可着实把王衍吓了一跳，北部边境那是什么地方，寒冷荒凉不说，时时要刀兵相见，没准哪支不长眼的冷箭射过来，小命兴许就没了。王衍好不容易躲过这趟差事，由此也知道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再也不轻易开口谈论世事。

然而很快王衍发现，真的管住了自己这张嘴，寂寞不说，他存在的价值也成了问题。聪明的他很快就找准了方向，说还是要说的，但只说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东西。不承想，王衍小试牛刀，就遭遇了挫折。有一回在宴会上，王衍谈玄正起劲，把一位本族人激怒了，对方可不管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操起个木头盘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打得王衍肉体 and 心灵都很受伤。不过他也没敢言语，拉着另一位本家兄弟王导坐上牛车就走了。在车上，王衍内心很不平静，他拿出镜子照着自己的脸，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眼光还是在牛背上呢！”他躬身自省，为自己的学问自责，谈论的东西别人还能插进话来，跟着辩论，说明境界还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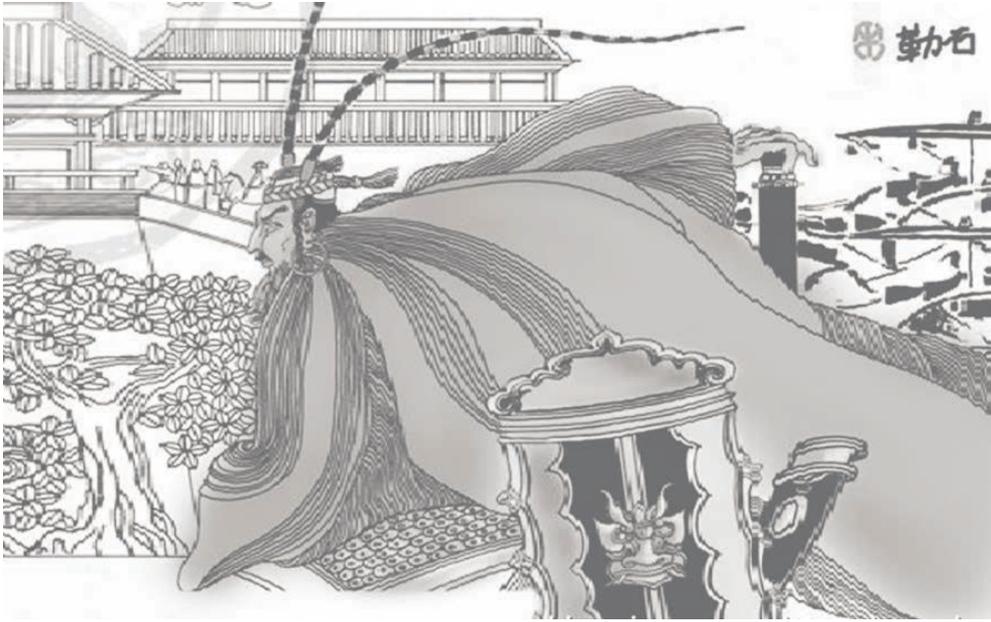
自此，王衍深入钻研老、庄，颇有心得，谈论虚无，讲授玄学，不久就名声鹊起，倾动当世。王衍与人清谈时，手拿着一把玉柄的拂尘，有一种化外仙人之感。他所讲的道理有时连自己也感觉不是很妥当时，他也没什么不好意思，随口就加以更正，时人给他起了个名号叫做“口中雌黄”。大约因为名气太大，朝廷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先后担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司空、司徒等要职，一时之间，朝野内外，莫不崇敬、仰慕他，以致高傲放诞的行为方式成了最为时尚的官风。

玄而又玄的东西固然可以忽悠别人，但绝不能把自己也忽悠了，这是王衍坚持的原则，对于现实生活中攸关性命的利害二字，他还是保持了十分清醒的认识。

王衍的女儿是愍怀太子的妃子，当初这可是一件人人羡慕的婚事，可世事难料，太子遭到了继母贾后的诬陷，王衍害怕会连累到自己，就向正处在倒霉中的太子提出离婚。太子悲愤地给妃子和岳父写了封亲笔信，详细叙述了横遭诬陷的情况，言辞悲切。后来，贾后被废，王衍此间的卑劣表现也为人所揭发，指责他当为善而死，而不为生而活，在得到太子的亲笔信后，也不为太子仗义执言，只想着自己如何侥幸免祸，没有一点做臣子的忠贞节操。王衍因此被免官，处以终身监禁。

正在人们以为王衍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再也没机会谈论他的玄学的时候，西晋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王司马伦篡夺了皇位，齐王司马冏等又起兵平叛，恢复了政权，在一番你争我夺、大肆杀戮之后，德高望重的大臣已所剩无几，王衍以过去的声名再次被委以重任。此时，经历种种变故的他越发有了危机意识，他虽然身居宰辅重位，依然热衷于清谈，从不考虑治国大事，暗地里想的全是自我保全之计。他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临行时，他一改玄虚的风格，不无得意地对这两个兄弟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相环绕，形势很坚固；青州背靠大海，形势很险要。你们两个在外，我留在京城，这足以称得上人们所说的狡兔三窟了。”

西晋内乱给了北方诸国以可乘之机，汉国将军石勒不断领军进犯。东海王司马越战死，大家一致推举以太尉身份担任太傅军师的王衍为元帅。王衍此时可没有谈论玄学的心思了，他对形势分析得很透：眼见贼寇四起，其势凶猛，每有奏报都听得心惊胆战，大元帅的位子可是那么好坐的吗？面对众人赤诚而渴望的目光，王衍放下身段，谦恭地推辞说：“我年轻时便没有当官的愿望，不过是一步一步升迁，才把官做到今天。如今国难当头，抗敌任重，怎么可以让我这不才之人担当呢？”



结果，群龙无首的晋军就为石勒所击败，王衍也不幸成了阶下囚。

让王衍始料未及的是，连北方的蛮夷之人也都听说过他的大名。石勒亲自接见了，并客气地称他为“王公”，询问了晋朝的内情。王衍陈述了晋发生祸乱及失败的根由，分析得鞭辟入里，切中要害。石勒听得很高兴，一直谈了很长时间。王衍察言观色，感觉有脱身的门道，就借机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打年轻时就不参与世事，只想做点学问，晋朝大政方针的失误都与自己无关。石勒突然变色，大怒道：“你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时就登上朝廷，直到满头白发，怎么能说不参与世事呢？破坏天下的，正是你的罪过。”说完，令左右侍卫把他“扶”出去。

石勒对他的同党孔苌说：“我走过天下的地方多了，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应不应当给他留命？”孔苌说：“他是晋国的三公，都不肯为晋朝出力，还能为我们出力吗？”石勒点头说：“对他这样没有筋骨的人，杀他不可以用刀。”当天夜里，就派人把墙推倒，将王衍活活压死了。王衍临死之时，回头对人说：“唉！我辈虽然不如古人，但以往如果不是崇尚玄虚，而努力匡正天下，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死时，年仅56岁。

王衍凭借极具迷惑性的“忽悠”博得名声，官至“三公”的高位，但骨子里却没有半点担当的精神和勇气，不论什么事，只知逃避和自保，最终落得个身名俱败的下场。他的悲剧，放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人缺少了责任的筋骨，不仅不能行走于世，而且终将为世人所唾弃。

1945年我军进入东北部队详细组成

2503387

1、曾克林、唐凯率领的冀热辽军区16分区十二、十八团及朝鲜义勇队，在首入东北途中扩大为4个团，约计4000人，1945年9月初到达沈阳、本溪。

2、李运昌率领的冀热辽军区挺进东北第2梯队，所属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团，出关后扩充为5个团和1个支队（后编为五十一团），约3200人，1945年9月初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城。

3、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一、二支队，约3500人，1945年9、10月由海路分批登陆辽东；10月一支队抵达磐石、海龙，二支队到达沈阳。

4、沙克率领的冀中军区三十一团，约1500人，1945年10月上旬到达锦州。

5、吕正操率领的晋绥军区三十二团，约600人，1945年10月中旬到达沈阳。

6、邓克明率领的冀鲁豫军区二十一团，约1500人，1945年10月下旬到达沈阳。

7、萧华率领的山东军区机关及直属队一部，约1000人，1945年10月初从海路进入辽东，组成山东军区东北“前指”。

8、吴克华、彭嘉庆、胡奇才率领的山东军区第六师及第五师十四、十五团，约8000人，1945年10月下旬由海路到达营口。

9、刘转连、晏福生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五九旅（已组成南下二支队），约3000人，1945年10月下旬到达本溪、抚顺。

10、文年生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一旅（已组成南下三支队），约3000人，1945年10月下旬到达锦州。

11、胶东军区田松海军支队约1000人，1945年10月

下旬由海路登陆庄河。

12、杨国夫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七师，约6000人，1945年10月下旬到达山海关。

13、刘其人率领的渤海军区新编师，约6000人，1945年10月下旬到达古北口。

14、罗荣桓率领的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及直属部队，约4000人，1945年11月上旬由海路到达沈阳。

15、罗华生、刘兴元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二师，约7500人，由海路登陆辽东，1945年11月上旬到达沈西。

16、梁兴初、梁必业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约7500人，1945年11月下旬到达锦西兴城。

17、黄永胜、赵承金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二旅各1团，约3300人，1945年11月下旬到达热河。

18、黄克诚率领的华中新四军第三师，约32000人，1945年11月下旬到达锦州。

19、何长工、陈伯钧、韩先楚率领的抗大总校及一、三分校和朱瑞、邱创成带领的延安炮校，共约2100人，1945年11月下旬到达沈阳。

20、罗舜初、曾国华、李福泽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三师、鲁中军区警备三旅，共约9000人，1945年12月初由海路到达辽阳、鞍山。

21、周保中率领的苏联远东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约400人，1945年8月底前进入中等及以上城市。

其中，前七支部队是1945年9月19日中央战略方针改变前先期进入或已决定部署于东北的部队。这七支先头部队再加上之后的十四支部队，人数总计为108100人，即通常所说的11万人。

刘中策、刘中瀚书法及佚名画册 (下)

高昂



三月长安桃李春，一条软绢天街新。汉朝覆试端门日，唐代题名雁塔辰。
官柳惯迎新贵马，杏花偏拂少年人。几队霓裳行簇簇，琼林院里春波绿。

戊寅春日家居无事，偶阅此册，因题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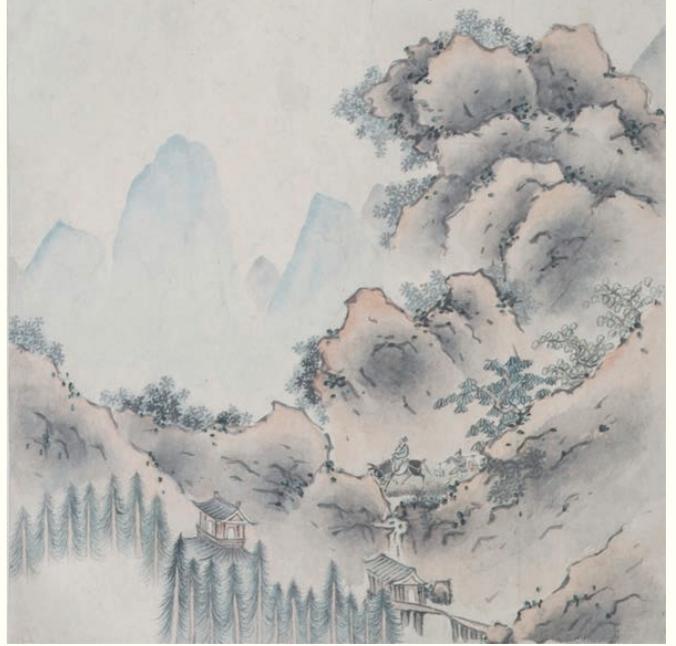
海帆刘中瀚

此为刘中瀚翻阅画册，有感而作。

刘中瀚（1835.3—1917.7），字海帆，号春舫，刘纶襄之兄，沂水县刘家店子人。少时目有奇光，远处看榜历历在目。同治十二年癸酉拔贡，甲戌殿试钦定二等第二名，以知县分发直隶试用；历任顺天府、大兴、署理霸州，又办通州海运，再调任宝坻、永清、固安等地知县、知州。其精明干练，清真爱民，办案效率极高，直督褒以“德被生民，荫及子孙，署任官能办此尤为罕见也”之誉。府尹奏保赏加一级，官至河北三河知府。在任时资助弟刘纶襄和曹鸿勋成就学业，辞职后在沂水创“登瀛文社”，主修《刘氏族谱》，上书都察院减轻沂水苛政、课孙读书、与子侄诗文相唱和，卒年八十三岁。

刘中瀚工书，精鉴赏，其行草潇洒流畅，雅逸清新，曾为刘涛所得之高南阜莲花手卷及高且园山水画题跋。楷书宗颜真卿，严谨工整。手抄先正格言等书成卷，又撰沂水《望仙寺碑》。





张广秀：一位沂蒙女儿的不朽青春

英 国



张广秀，临沂市罗庄区罗庄街道办事处桥西头村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省十佳大学生村官。2009年7月毕业于鲁东大学，当年8月考取大学生“村官”，到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垆上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张广秀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赢得党员干部群众好评。2010年9月，张广秀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住院治疗，在医院仍惦记着工作。张广秀的事迹和病情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习近平、李源潮、姜异康等中央和山东省委领导做出重要批示，对张广秀扎根农村、无私奉献，全身心为村民服务，身患重病不忘本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向张广秀同志学习。

2011年初，张广秀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治疗，两次接受造血干细胞输注手术。当年5月31日，张广秀出院。2013年6月17日，张广秀重返阔别了33个月的村官岗位。

2016年8月21日，张广秀因感染在临沂人民医院去世，年仅30岁。

一

2009年8月10日，张广秀被分配到福山区福新街道垆上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兼团支部书记，虽然一开始工作不熟悉，但她注意观察、注意积累，每次村里开会、调解村民矛盾纠纷，张广秀都在旁边边听边记，学习工作方法。“有什么事情不懂就观察，特别注重学习，因为村里事务繁忙，村民纠纷需要调解，每次她都主动要求参与，细心听取老同志处理事情的方法。

担任“村官”以后，张广秀利用自身电脑技术专长，帮助村里将所有的资料进行电子量化整理。在基层党建、惠农服务、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农村账务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一名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村里有大量的报表需要统计录入，每次白天的工作干不完，张广秀都要带回宿舍处理，第二天，她保准都能完成。”村会计于学超平时和张广秀相处的时间最长，对她的印象也很深。张广秀在日记中写到：“作为大学生村官，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作为农民的一份子，虚心向农民学习，先当‘村民’后当‘村官’。”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她走访了村内大部分村民，详细了解村民的所思所盼，用自己的所学所知，积极为民排忧解难。72岁的李树汉老人，是村里的老会计，对村子的历史很熟悉，张广秀遇到不懂的事总是去请教他。“她经常跑到我家里来，帮着老伴折纸箱子，小姑娘干活特勤快，和老百姓很贴心，经常来跟我们老人唠嗑，她这个‘村官’干得有模有样。”樱桃园里时常有她帮着群众干活的身影；村民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向她请教。她成了一名大樱桃种植“专家”、帮助村民解难题的“大管家”。

二

2010年8月份，村里准备让她接管计划生育工作。张广秀得了感冒，晚上睡觉时脖子疼得厉害，身上还出现紫点。平日体质很好的她没有放在心上，她在日记中写到：“这连续两周的不敢动脖，不敢写画，真是折磨死我了。这股疼是我这么多年来未曾体验过的。想起来以前连吃药、打针都数得清次数的人儿，现在每天痛得直流眼泪，大把大把地吃着一些抗生素，却不见好转，躺着比较放松，但辗转反侧间，那可能连着脑袋的脉络噬心般的疼”。领导、同事们见她身体不适，立刻带她到福新街道卫生院、解放军107医院检查，均无确切的诊断结果。最后经赴天津血液研究所请专家研究，最终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三

“我时常会想起以前的‘村官’生活，一想到身边有那么多关心我的领导和同事，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工作岗位。”病床上的张广秀一谈起自己的“村官”生活，精神好像也变得好起来了。没得病时，她不喜欢坐在办公室，有时间就出去走走，和村民聊天，帮着解决难题，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工作一年多来，她坚持每天写“村官”日记，记录她“村官”生活的点点滴滴：“生病不能阻断我的工作。带病书写百余份健康档案，去村送通知，安排防疫，接受新工作——撰写包村计划等等。最重要的是压在心头上的‘村官总结’没思路，没体力，干着急。咋办，毛泽东主席的话：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上半年她还主动向我申请要入党，我正



着手准备给她打申请，没想到，这孩子竟能患上这种病！”村支书王子龙难掩悲痛。

躺在病床上的张广秀仍然表现出坚强和乐观的一面。在痛苦和煎熬的治疗期，她时常躺在病床上，面对着头顶的天花板，想起之前的“村官”生活，精神就好了很多；看到身边的父母，想起那些关心她的人们，她就时常鼓励自己，积极抗争病痛的折磨。张广秀非常感谢关心爱护她的人们：“看到有这么多好心人为我的事操心，真的非常感动，我相信自己会很快好起来的！病好了，我还回去当“村官。”

四

张广秀的事迹和病情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习近平、李源潮、姜异康等中央和山东省委领导做出重要批示，对张广秀扎根农村、无私奉献，全身心为村民服务，身患重病不忘本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向张广秀同志学习。

2011年初，张广秀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同年3月6日、7日，她两次接受造血干细胞输注手术；5月31日，张广秀出院回家休养。

经过两年多的休养，2013年6月17日，张广秀重返阔别了33个月的村官岗位。她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下那一天：“阔别了3年，今天我终于回来了——福山新垆上和亲爱的人们。我回家了！”

很多人并不知道，急性白血病的恢复期其实有3年时间。可挂念着工作的张广秀，提前返回了工作岗位，兑现了她在生病期间许下的“病好了，还要回去当村官”的诺言。

回到岗位之前，张广秀与当地组织部门签署的村官3年服务协议本已到期，她很早就与组织部门沟通起续签协议的事。在经过多方征求意见之后，张广秀在回到岗位之前，又续签了3年的服务协议。

2014年1月15日，张广秀致信习近平总书记，详细汇报了自己回到岗位上的工作生活情况，表示一定不辜负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努力工作，服务群众，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让张广秀没有想到的是，5天后的农历大年三十，她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复信。复信说：“请转达我对垆上村乡亲们的节日问候！来信收悉，感谢你和乡亲们的祝福。得知你康复良好、重返岗位的消息，我感到很欣慰，同时希望你仍要注意保重身体。”

改变农村面貌，帮助农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推动广大农村全面建成小康，需要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需要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不懈努力。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以来，数十万大学生走进农村，热情服务，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你们的付出和贡献，农民群众有最真切的感受，我看了很多反映大学生村官事迹的材料，为你们的进步和成绩感到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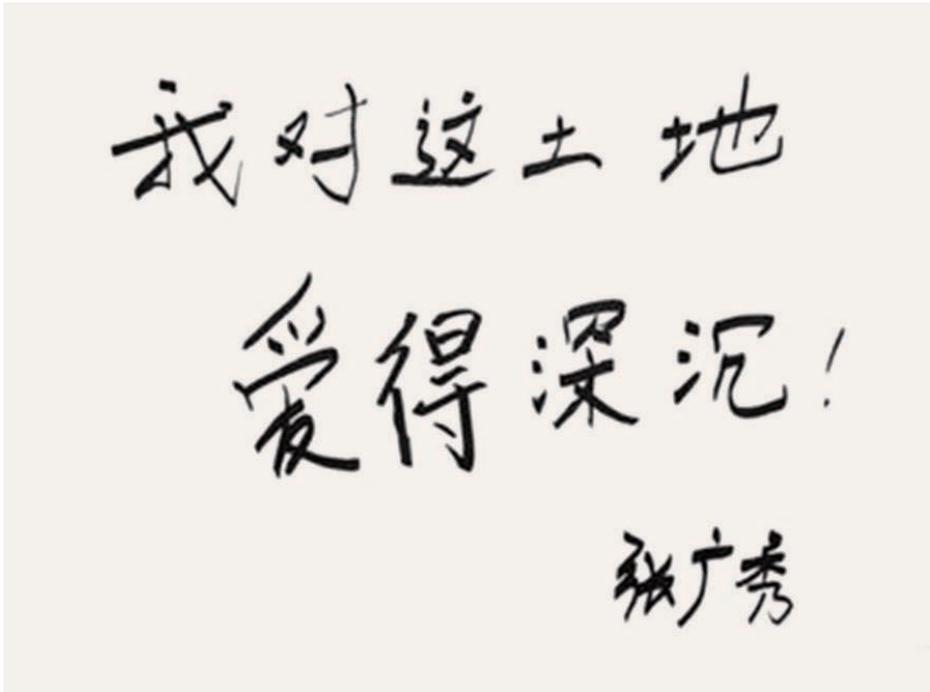
希望你和所有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接到复信，张广秀很激动：“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村官，没做多少工作。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给了我很多关爱。我一定扎根基层，虚心学习，脚踏实地地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新农村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让青春无悔！”

只是，病魔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乐观的姑娘，一次小小的感冒发烧都有可能让她失去宝贵的生命。2016年8月21日，张广秀在家中不幸感冒，随后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但最终病重离世，年仅30岁。

张广秀的骨灰被葬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里，蓝天白云下，这片养育她的土地接纳了这位在最好年华里离去的沂蒙女儿。



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
张广秀

沂蒙根据地反“扫荡”^(上)

1941年11月至年底，日军调动5万余日伪军对我沂蒙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拉网“梳篦”式推进，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歼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沂蒙抗日根据地。

此次反“扫荡”斗争，历时50多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日伪军2000余人，我军政人员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3000余人，被抓1万余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困难情况下，罗荣桓、朱瑞等领导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斗争，实行避实就虚的灵活战术，打击敌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保存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有生力量，坚持和巩固了沂蒙抗日根据地。





在莱芜召开反“扫荡”誓师动员大会



在反“扫荡”中，部队冒着风雪转战于博山地区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三)

赵丹峰



朱元璋

明代，是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建立的由汉族人主政的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朱氏一族也因此成为国姓。从太祖（洪武）朱元璋开基，至思宗（崇祯）自缢亡国，大明共历16帝，计276年。在述及明代帝王的建树时，《明史》作了如下评价：“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笔者认为，《明史》的上述评价是中肯的。受篇幅所限，故只能以简洁的笔触，对上述五位帝王的主要建树概而述之，以飨读者：

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大明王朝的创建者。朱元璋本名朱重八，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佃农之家，曾念过数月私塾，后因家境甚贫而辍学。在给地主家放牛时，与同为放牛娃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结为好友（这些人后均成为其麾下的股肱之臣）。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流域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其父、母、长兄在数日内相继染病去世，因无力购置棺木，年仅16岁的朱重八，只能与二哥一起，将三位亲人草草掩埋。对此悲惨际遇，朱元璋终生不忘，以至在其登基称帝后，他亲撰《御制皇陵碑》时仍伤心写道：“殡无棺槨，被体恶裳。浮掩三尺，莫何肴浆！”在二哥为活命外出逃荒后，孤苦无依的朱重八为图有粥糊口，

在邻居的帮助下，到于皇寺（朱元璋称帝后，重建此寺，并改名皇觉寺，后又改称大龙兴寺）做了一名小行童。小行童还算不上和尚，地位比和尚低，主要在寺内干杂活，受人驱使。未及仞月，朱重八又被打发出寺，做了四处化缘的游方和尚，游历于淮西、豫南一带。三年间，他虽然餐风露宿，但也因此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发奋读书。他的这一特殊经历，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正十二年，他受儿时好友汤和邀劝（汤和已先他参加了起义军），投濠州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帐下成为亲兵，因智勇过人，屡立战功，颇受郭子兴器重赏识，很快成为军中主将，郭将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并为其改名为元璋，字国瑞，军中遂以“朱公子”呼之。后离开郭子兴，自行发展。为不引起郭子兴的猜疑和反对，临行时，他将自己原率部队悉数留下，只带徐达、汤和、周德兴等24名嫡系挚友南下定远发展。通过收编地方散兵游勇和土匪，很快壮大了军队的规模，随即严明军纪、安抚地方，所率部队被当地民众誉为仁义之师。不久拿下滁州城，其势力更为壮大。至正十五年，郭子兴病死，红巾军龙凤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相继任命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大元帅，全统郭之旧部。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以此作为其经营江南的大本营。至正二十一年，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旋即击败陈友谅，至正二十四年，又消灭了其他残余割据势力，改称吴王。至正二十六年，根据形势的发展，他决定与红巾军划清界限，发布文告，咒骂红巾军为“妖”，并遣部将小明王韩林儿从滁州接出，行至瓜步山（六合东南）时，把船凿漏，将韩林儿沉入长江。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去除红巾军政权的龙凤年号，称吴元年，遂破平江（今江苏苏州市），灭掉张士诚，铲除了江南地区的最后一个大的割据势力。旋即命大将徐达率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八月，徐达率部攻克大都（今北京），彻底推翻了元朝在中原90余年的统治，之后很快统一了全国。

纵观朱元璋的一生，其前半生是打天下，后半生是坐江山。在打天下的16年间，他之所以能从红巾起义军的一名普通士卒，最后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帝王，除了他自身具有非凡的雄才大略之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立志夺取天下的斗争过程中，能够从大局考虑，不仅广纳人才，而且礼贤下士，从善如流，使这些栋梁贤达能够人尽其才，在其事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阶段，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最终成就了他改朝换代坐江山的夙愿。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攻下滁州城，时已42岁的李善长求见朱元璋。李善长早年弃文经商，系定远一带的大财主。他善于谋略，与朱元璋相见后，朱元璋略带困惑地问李善长：“如今天下大乱，何时方能太平呢？”李善长答道：“秦代末年，亦是天下大乱。可出身下层的汉高祖刘邦气量如虹，善用人才，且从不滥杀无辜，结果仅用5年时间即统一了天下。而今天下土崩瓦解，您何不效法汉高祖，以图大业呢？”朱元璋听后茅塞顿开，从此立下了统一江山的远大志向。并效法汉高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他让李善长担任其帐下记室（类似今之秘书长），凡涉机要大计均与李善长谋议商榷。李善长还主动帮朱元璋协调诸将领之间的关系，使之同心协力，所向披靡。

至正十七年，朱元璋攻下徽州后，经邓愈推荐，朱元璋召见了举人出身曾任学正的当地名儒朱升，向其请教时务，朱升见朱元璋心诚意切，便向他建议，应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所谓“高筑墙”，即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所谓“广积粮”，即是要发展生产，储备粮草；所谓“缓称王”，即是要不要图一时虚名，应韬光养晦，暂不称王。朱元璋听后大喜，即制定了在两淮和江南地区施行“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方略。他下令在军中专设都水营田司，专司屯田种

地、兴修水利之责。规定诸将率部在控制区垦荒种田，并以生产数量、质量实行赏罚。同时推行民兵制度，组织万千壮丁一边练武，一边种地。这些措施使军队很快实现了粮草自给有余，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其根据地内广大百姓的普遍拥戴，而且为其日后发展储备了训练有素的充足兵源。

至正二十年春，已占据江南部分地区的朱元璋，其事业发展处于关键节点。他主动将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江南名士请至应天，诚恳地对四人说道：“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随即答道：“天道无常，惟德是辅，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朱元璋闻听此言，遂对四名士肃然起敬。即建造礼贤馆供他们居住，恩礼有加。根据各自的特长，朱元璋命刘基总谋军机大事；命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兴学育人，并兼做其长子朱标的师傅；命章溢、叶琛为营田司佾事，专司民政治理。其中刘基最为朱元璋器重，誉之为“吾子房（汉代张良）也”。刘基（字伯温）深感知遇之恩，凭其卓越的军事谋韬，为朱元璋制定了“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而后北向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当时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乘坚船利舰沿江东下，妄图与另一割据势力张士诚相约夹击朱元璋。在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朱元璋见很多人怯敌畏战，便向刘基询问破敌大计，刘基答道：我们必须与陈友谅决一死战而不可弃城而遁。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必须要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兵力迎击陈友谅，方使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而争取主动最好的办法即是诱敌深入。为使陈友谅上当，朱元璋和刘基命已投归朱元璋的元军水军元帅康茂才（系陈友谅好友）写信给陈，诈称可做内应，助陈友谅一臂之力。战事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基的预见，使陈友谅遭受重创，在日后的鄱阳湖水战中被朱元璋歼灭，使朱元璋消除了其事业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威胁。正是由于朱元璋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使其麾下聚集了诸如文有李善长、刘基，武有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一批儒臣猛将，使之相继摧毁了各大割据势力，并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开创了大明王朝的基业。

在其后长达31年的坐江山的历程中，朱元璋以“为万世开太平”的非凡魄力与



朱元璋北伐

智慧，在如下几个方面，为大明王朝的开基、巩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建树：

在政治方面。为保大明江山永固，明太祖在实施了如下重要举措：一是大封诸子，屏藩王室。鉴于历代地方割据和叛乱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同时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镇守和对外部势力的威慑，为了达到通过依靠朱氏父子“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之目的，明太祖分别于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十一年和洪武二十四年，先后三次分封藩王。除已立为皇太子的长子朱标外，其余24个儿子和1个从孙（系其侄朱文正之子）计25人均被封为藩王。这些藩王分别被封在从东北至西北与西南的靠近边境的重要城池中，其护卫少者三千，多者及万人。像坐镇北部的宁王、晋王和燕王所率兵力更多，其中燕王朱棣即拥兵十万，驻守北部边塞的大将均受其节制。为了限制藩王的权力，加强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明太祖制定了“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的分封规则，即诸皇子虽分封各地为王，但在其藩府之外，却没有自己的封地和臣民，诸王所需的用度开支，皆从朝廷颁给的“宗禄”中解决。

二是制定法律。明朝立国后，明太祖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循正吏治，惩治奸小，采取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大明律》和其后的《大诰》遂应运而生。早在朱元璋为吴王时，即命其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以唐律为本，编定律令，在其根据地内颁行。创建大明后，明太祖认为原法律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洪武元年始，便亲自与有关官员一起研究《唐律》。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领修《大明律》，翌年完成。后经数次修改，于洪武十三年正式颁布实行。洪武三十年，又做了修订完善。《大明律》共有30卷，计460条。该律克服了元代法律冗长繁琐的弊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较为完备的一部国家法典。此部法典突出体现了明太祖重典治国与重典治吏的思想，与前代法典相比，《大明律》在量刑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罪轻者更为减轻；对罪重者则更为加重惩处力度。前者主要系涉及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诉讼，后者主要针对谋反、大逆等罪。如对“十恶”大罪（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历代均定为“遇赦不赦”之重罪，其中对谋反罪，《大明律》一改唐律穷追首恶的规定，明申如犯此罪，无论系主犯还是从犯，皆一律凌迟处死，其三族以内凡16岁以上男子皆要斩首，就连左邻右舍亦要杀头。同时，《大明律》还将斩、绞列为轻刑，获罪犯人多被以凌迟与剥皮处死，从而开严刑乃至酷刑惩罪之先河。

为达“警省奸顽”之目的，明太祖在制订颁行综合性法典《大明律》5年后，又自洪武十八年始，亲自采辑“官民过犯”的典型案列，历时两年，纂成《大诰》一书。《大诰》（亦称《明大诰》）含《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部分，共计236条目，其中《初编》74条、《续编》87条、《三编》43条、《武臣》32条。共记载被处凌迟、梟首示众、诛九族的案列近5000个，记载被弃世以下的案列万余条。为达警世效应，明太祖下旨要求全国臣民“户户有此一本”。如犯死罪以下，凡家中有《大诰》者可罪减一等，如无此书者则罪加一等。同时还要求天下各级学塾皆要聚生徒教诵《大诰》。3年后，又要老师率其生徒到礼部背诵《大诰》。仅洪武三十年一年内，全国各地师生赴礼部诵《大诰》者即近20万之众。《大诰》选编的案列多属惩治地方胥吏和豪强，由于惩处犯罪时多以书中之“实例”作为参照物，故此书在实际上已成为律外之法。这种以“律”外附“例”惩治犯罪的操作形式，成为明代法律有别于他朝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是改革吏制。早在大明王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即在以应天（今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内建权置吏。称吴王后，即置中书省，在其辖区内置行省、提刑按察使司，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置宣慰司和宣抚司等。明朝开国后，明太祖从加强中央集权

统治这一大局考虑，对大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吏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明太祖将元代的行中书省（现在省的前身）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同时将元代行省的最高长官丞相（即省长）改为布政使。不仅名称改变，其权力亦大不相同：元代行省的丞相（即省长）是总揽一省军政司法大权的实权大员，而明代的布政使则仅负责一省的财政与民政。布政使作为皇帝派往各地的使臣，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中书省（中央政府）负责。与此同时，明太祖又在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名司法，军事则归都指挥使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行省“三司”。明太祖还撤销了路这一级行政，形成了承宣布政使司（省）、府（直隶州）、县（州）三级行政结构，从而减少了政令下达的层次，提高了行政运转效率。在妥当解决地方与朝廷（中央）的矛盾之后，为了消除中书省（中央政府）权力过大，丞相大权在握，客观上形成皇权与相权相左，相权危及皇权的现状，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正月以谋反之罪名，将左丞相胡惟庸斩首并诛其三族。以此为契机，下旨撤销了统管中央六部的中书省（中央政府），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明谕从此不再设置丞相，日后如有人再敢提议此事，将以重典处之。在解决好中央政府问题后，明太祖为了控制军队，于是下旨将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领所属都指挥使司和卫所。五军的都督虽管辖军政，但却不得直接指挥军队。都督率兵打仗须有皇帝的圣旨和兵部（国防部）的调兵命令，但兵部虽有调兵和任免军官之权，却不能指挥军队。这样，军权便牢牢掌握于皇帝一人手中。在解决了军、政问题后，明太祖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监察，在都察院下又设置13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衔不高（仅为正七品），但在监察弹劾官员方面却拥有很大的权力（习称以小监大）。至此，明太祖凭着其绝对的权威与超非的气魄，建立完善了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且共同对皇帝负责的体制，使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为防政变，他还建立了专门监视大臣不法行为的严密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基于阉党祸国的历史教训，明太祖明令宫中宦官不得干政，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宫中仆役。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在日后便被他的后代们所遗弃，使宦官重新走上了干预朝政的邪途，甚至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四是铁腕猛政惩腐肃贪。明太祖出身赤贫，对元末官贪吏污、巧取豪夺、鱼肉人民的劣行切齿痛恨，耿耿于心。大明开国后，他见一些官员仍承续前朝流弊，贪贿之风并未消减后，遂决定采取极为严厉的举措惩治腐败，并以此为契机，期望逐步培育形成风清气正的新的官场生态，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使他创立的大明江山久安永固。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八年，一场声势浩大可谓空前绝后的惩腐肃贪风暴，便席卷中华大地。颁行于洪武十八年的《大明律》规定：“枉法八十贯论绞”。由于在随后由太祖亲编的《大诰》以“例”补“法”，所以在肃贪过程中，对枉法者的实际惩治要比《大明律》的规定严酷许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载：“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述，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梟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神），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除斩首剥皮之外，明太祖在惩治贪官劣吏时，还有墨面文身、挑筋、剜膝、剜指、断手足、凌迟、族诛等诸多酷刑。《廿二史》中所述及的关于许民赴京告发贪官乃是洪武十八年之事，一年后，为了加大惩腐力度，太祖又将“民可告官”的规定修改为“民可捉官”，即任何民众布衣皆享有自行捉拿贪官劣吏押其赴京问罪的权贵。其范围包括：强买百姓东西不付钱者；收税不公平者；受贿放纵罪犯且以同姓同名百姓顶替者，等等。总之，凡涉贪赃枉法之官吏，均在可捉拿之列。由于此规定是对“官贵民贱”这一数千年既定理念的彻底颠覆，故在颁布之初，鲜有百姓敢去实行。深谙“典型（含



朱元璋亲政

正、反两个方面)可以引路”之道的明太祖,便先在镇江一带惩处了一批不按其旨意捉拿赃官的百姓,将他们“尽行责罚搬石砌城”。而对少数胆壮先行者,则给予奖赏。这一典型引路之举很快产生了积极的动员效应,一时间,各地押送贪官劣吏赴京(今南京)问罪者络绎不绝。有的贪官从城里逃回其家乡躲避时,也被自己的亲戚、邻居拿住送京(因为亲戚邻居怕受牵连)。在这11年间,几乎无一日不杀人,一些衙门因官吏被诛过多,以至到了无人处置公务的程度。为保证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太祖不得不实施对犯罪相对较轻的官员,允许其先戴着刑具暂回公堂办公理政的妥协办法,其名曰“戴死罪,徙流办事”。据不完全统计,在明太祖实施肃贪惩腐期间,全国各地官吏中被判处死刑及流刑(须充发背井一千里之外)者达8万余人。应当指出,由于这种“运动”式的全民发动治贪惩腐,难免会造成一些冤案。如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在未作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即被处死。死后,明太祖又下旨剖开其腹腔,以图将其贪腐之罪验明证实。当人们看到从滕之肠胃中取出的不是什么珍馐佳饌,竟是粗粮草菜时,均目瞪口呆,目睹此情景的明太祖也不禁喟然长叹道:“此卿原本系一大清官矣!”明太祖实行的肃贪惩腐,是对元末以来贪腐之风的一次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其手段之严酷,规模之大,惩戒面之广,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间,当然也错杀了一些像滕德懋这样的清官,但总的来看,在当时与日后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刹住了曾一度盛行的贪腐之风,使众多官吏言贪色变、胆颤心惊,其积极作用应当予以肯定,这也成为明太祖执政生涯中最受人称道的亮点。刚猛肃贪亦成为长期以来人们思考和议论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据说,某地一位主政官员在太祖肃贪期间勤政为民、清廉守法,离任后按惯例到位于衙门左边的专剥贪官人皮的土地庙(时称皮场庙)辞行时,不禁触景生情,遂赋成一诗:“此地为官几经春,无愧苍天无愧民。神祇有灵应知我,去和来时一样贫”。此诗可谓道出了洪武年间绝大多数为政官员的心声。

丁守存和《编年自记》_(下)

丁兆铭

《编年自记》原文

咸丰十一年，辛酉，五十岁。

二月，销假北行。至益都县之张孟口，闻贼从西至，折回潍县，贼已不远，因复旋里。贼已破安邱，至诸城县之北境。因集团数千，御于两城镇。贼由西路窜去，未入境。

五月十三日，西南小股土匪至碑廓镇，焚劫，复集团至山口御之。先是，众议避乱计，有依山者，有入海者，予独力持不然，不若修堡为要。众不之信，谓堡失利，则无子遗；且工巨难成，人心不固。予仍坚执其说。因于去家八里之涛锥口倡议，众仍疑信各半。更有以风水为词者，予仍执前说。苦口开导，倡捐^[104]五百千文。即于三月十八日兴工。量周围，市尺三千八百余尺。鳩工^[105]集事，次早日出后，有云气一道，从堡工起，蜿蜒如龙，直接东北奎山之上，未卜何祥。而众议纷纭，谓堡西乃来脉之处，掘出五色土，细腻如脂，大不宜，力辩无碍。适邑庠生许遵自城来，言城中亦有兴工之议，而尚未决，邀予往视。



丁氏故居

四月初一日，赴县至吕翰方家，即^[106]大署，与县令张公书升议定，次日兴工。时集资不满三千缗，予倡捐四百缗，并力图之往来于城与涛之间。城工以族叔永董^[107]其事，诸亲友副之；涛堡以族叔岫董其事，诸族邻副之。不数月，皆就绪。礮火亦略可用。通计城工所用，一万余缗，堡工不及二万缗，人心大定。

八月初二日，南匪大股由山口拥入。予先携家入涛雒堡中，各乡邻见予已入，始敢从往。予借居侄孙健五家厅院。贼至，列阵于西，时潮水甚大，为从来所未有。西面土堞尚未全备，墙复不整，赖水以安，连夜督工修筑。北风骤凉，彻夜率儿凤年巡查防守，迨至初五日，贼尚不退，因选壮士三百人，开北门出抵之，至尧城新庄一带，贼大奔溃，得其锣鼓旌矛。出村后，见大队白旗向东北去者，不下数千人。我众甚少，且农人未经战阵，不敢深追，亦不敢遽退，因斜入西北，借树林插旗为疑兵，复折而东南。凤年带百余人前来策应，驰至石梁宅中，屋虽未毁，而狼藉不可名状，书籍粮食满地，杂马粪中。回涛后初九日，股匪又至，破夹仓寨，被害者五六百人。初十日扑涛寨，见有备而去。嗣^[108]又添修空心礮台十处，并造石礮，添大礮。

十月初六日，大捻又自北而南，蚁聚蜂屯，计阔五六十里，长一百五十余里。无村不火，无地不尘，而涛堡幸无恙，烟入堡中，围墙几不可辨。初七日早，列队北门，势将攻扑，申酉，贼始去尽。南门外置石礮四枚，以绳扯响，其声如五千斤巨礮。贼后队闻而飞奔。石梁住宅并先祠已煨烬矣。

冬月，租居族侄卬基住宅十余间。

同治元年，壬戌，五十一岁。

三月，因直督屡次札催，不得已出山。同邑亲族耆老，攀留恳切。

四月至保省。

五月赴都。时长婿费学曾署任宛平，留住十余日。回省后，以广平绅士刑部员外武汝清等八十余人联名呈请，文制军据情入奏，奉旨：“仍赴大顺广办理团防。”因复为筑寨之议，劝成二百余处。

闰八月，子凤年由东省出闱至广平，旋闻报中式举人二十七名。

九月赴大名，率同肥乡县杨令毓枏捕获首逆王守清，解送都统遮克敦布营中正法。

十一月，降匪张锡诛，作乱，大名道秦聚奎失利殉难。

十二月，仍回广平，贼势蔓延。各处民团并力御之。

同治二年，癸亥，五十二岁。

户部尚书罗惇衍，以“晓畅戎机”保奏，奉旨送部引见。四月初五日到京，子凤年会试已出闱，初八日报中五十五名，以知县分发即用，遵例指省^[109]河南。予以旨仍回直隶。

六月初一日，至威县刘制军长佑军营。旋奉委赴直东交界，集团御贼。

八月二十八日，在清平县辛集地方，猝遇贼至，率仆御四人，只身出，遇贼马十余匹，以洋铳^[110]却之，得免。从人杨玉落后死。

十二月以劳绩，奉旨加三品衔。

是年，长婿费学曾由宛平令特擢天津守，旋调保定守，加道衔。次婿王肇震，以团练得五品衔蓝翎府经^[111]。内人许氏，率子及媳至广平。

同治三年，甲子，五十三岁。

正月十二日，儿凤年率媳苏氏赴河南。

二月善后事竣，回省。直督刘片奏：以“直境肃清，该道才学素裕，历练亦深，先后在直六年，备著勤劳，诸无貽误，现在差事已竣，可否来京候简”等语。

奉旨：“著来京，以道员归部铨选^[112]。”

三月二十七到京。四月朔^[113]呈报到部，选授湖北督粮道缺。

五月初三日引见，次日述旨，具折谢恩，领凭出京。

六月，至河南省城，住凤年寓所。

七月由襄阳至湖北。

八月二十五日，接印任事。时总督大学士果威伯官文巡抚、吴昌寿布政使、厉云官按察使、唐际盛盐道。盛康是科甲子乡试，凤年分校河南闱，得士八人。

同治四年乙丑，五十四岁。

四月二十四日，兼署臬司印务，具摺谢恩。奉批“知道了。”甫^[114]接印，即奉委审办湖南遣犯革员李际晟京控巨案，案内牵涉巡抚以下四十余人。意图拖累，反噬^[115]，数年未结。当即撮其要害，堂讯一过，已俯首无辞，递^[116]供认诬，案遂结，并未牵及一人。吴中丞调河南抚，郑中丞敦谨，到鄂。

五月，儿凤年以侦探差来鄂，时已题补涉县缺。九月回豫，部覆^[117]已到。十月十一日到涉县任。

十二月，提督成大吉勇因饷绌^[118]，哗溃^[119]，捻匪乘机陷黄陂。予出库银二万两，设法激励，成勇人心大定。

同治五年丙寅，五十五岁。

二月，贼出楚境。

三月，郑中丞内擢^[120]户部侍郎。新抚伯爵曾国荃到任。

四月，方伯何璟到任。唐际盛回臬司本任。予于是月二十六日交卸。

六月，江水盛涨，居民多被水灾。

七月后复大旱。

八月唐臬司以旨送部。予仍以粮道兼臬司篆。初八日接印任事。具折谢恩。奉批：“知道了。”平反当阳县妄孥教匪大案。

冬月，捻匪入境，云梦、应城、天门失守。曾中丞带兵出省，督相官文以被劾，奉旨，撤任户部侍郎。谭廷襄暂署督篆。

是冬，凤年以知县同知衔，遵例加捐知府，在任候选。恭遇覃恩，请三品封典，并敕赠曾祖父母。

是冬，次婿王肇震得免补府经，以知县用，携次女甥孙来署。

是年，置买涛雒南门市宅一区。

同治六年，丁卯，五十六岁。

二月，留颍须。

三月十二日，交卸臬篆。新任臬司李榕到任。

八月入闱监试。凤年由河南涉县调省充外簾誊录官。长婿费学曾升授直隶清河道加运司衔。次婿王肇震以知县指省江苏。

是年贼窜山东，扰及日照五次。湖北省火药局于十月二十五日失火，震毁民房数千间，伤毙人口数百名。水旱频仍，荒歉异常。八月二十五日，次女在署，添甥孙一人。三月，接家信，叔弟守任卒于家，年四十六岁。五月，所访胞叔遗腹子自照由涉县来署，年已四十四岁。因择吉设位致奠，令其归宗。为捐从九品^[121]衔，名之守宗。其子三人，名之翼年、翰年、翕年。此先人未竟之志，访之数十年始得举行。其生母姜氏尚在。具呈遗抱回籍，递县存案，并通知族支各长幼辈，以防异议。

是年，湖广制军以伯爵李鸿章补授，未到任。以苏抚李翰章署臬司，李榕升湖南藩司，湖北臬司王文韶补授。曾抚军国荃引退。湖北巡抚以郭柏荫补授，何璟护

抚篆，王署藩司，郑兰本署盐道，盛康丁忧缺，因署臬司，何维键署盐道。

是冬，东股捻匪平。

同治七年，戊辰，五十七岁。

次婿王肇震携眷正月赴苏。

六月，在陕甘后路粮台捐助军饷。陕抚刘奏，赏花翎。儿子凤年亦得移奖，并赏花翎。

九月，又蒙两院以“从前校练洋队，保护省垣，及成勇哗饷力支大局”奏，奉旨交议。旋奉部覆奏，准加布政使衔，即由陕局捐，请加二级，从一品荣禄大夫，一品夫人，封典赠及三代，并封本身妻室。

是年，长婿费学曾亦以劳绩，在清河道任赏二品衔花翎^[122]。北股捻匪平。鄂省各营陆续裁撤，新添长江及荆襄两河水师。为次婿王肇震加捐分缺。先用^[123]花样^[124]瑞芝二本生于署内新建小厅西柱础下。盐道刘子城到任。

同治八年，己巳，五十八岁。

守宗弟携妻子来署，为延师授翰年、翕年读。

正月，督宪李爵相到任；王文韶升湘藩司；郭中丞何藩司俱回本任。

九月，督宪赴蜀查办事件；何藩司调晋藩；张建基升臬司，旋升藩司；刘策先放臬司。

是年大水，灾区甚广。

八月，内子赴涉县凤年儿任所。

同治九年，庚午，五十九岁。

四月，凤年调任归德府柘城县。

五月，内子回署。

六月初六日，妾封氏生子，名之麟年。

七月，督抚会奏，查验长江水师新建各衙署。

八月，入闱监试，设法以江水灌注于闱中，以供汲饮。是科，官吏士子无一病者，水之力也，且诸弊可绝，众称甚安。

十月，监武闱^[125]试。是岁，督相调直督，以浙抚李公翰章补授两湖总制。盐道刘丁忧^[126]，陈睿补授。九月丙子，赴苏次女家王肇震处，闰十月回署。

是年，水更大，灾区分别蠲^[127]缓，库储较絀，长婿费学曾署直臬后，引疾开清河道缺。

同治十年，辛未，六十岁。

二月十二日，正庆^[128]，自督抚学使司道府厅，州县以下均以诗屏、联幛介祝^[129]。在新修文昌阁演戏三日酬客。

四月，凤年以缉捕不力被参撤。

五月奉到部文：七年俸满，循例调取。引见督抚，会衔片奏请缓。奉旨：“吏部知道。”

八月，稟请交卸，奉允，以候补道何国琛署理。

九月初六日，卸事。初七日，携眷登舟，以轮船牵行至瓜州口清江。谒见张漕帅之栋。

十月十一日到籍，适凤年请假归省^[130]。亦于是日到籍。

冬月，敬谒宗祠、坟墓，并营新居于涛雒口，草创未竣。

同治十一年，壬申，六十一岁。

二月初二日启行北上。二十四日到京，赴部投文。

三月初三日，吏部带领引见。次日奉旨：“着回任，钦此。”初五日具折谢

恩。

十三日出京。四月二十九日到籍。

五月十九日携眷启行。瓜州口登轮船。

六月初九日至湖北，十四日接印回任。

凤年于十月二十日到南阳府南召县署任。内子赴南召任所，年底旋署。

是年，陈盐道故，黄昌辅补授。

同治十二年，癸酉，六十二岁。

正月二十六日，恭逢皇上亲政大典，各官加一级，准予封典。张藩司开缺，以林之望补授。刘策先丁忧，以黄昌辅署臬司。

闰六月，以痰嗽复作，具稟开缺。

七月十三日交卸，二十九日登舟。

九月过淮，漕帅文质夫彬坚留襄办一切，致聘千金，却之。

九月十七抵里，旋阅《邸抄》，湖北督抚奏称：有“该道品学素裕，颇有文名，在任九年，办事极称认真，今年逾六旬，奋勉从公，并无贻误，现已因病开缺，尚堪起用”等语。旨：“吏部知道。”

同治十三年，甲戌，六十三岁。

文漕帅调署东抚，坚意邀请。

正月至省，住抚署二十余日。以本省引嫌，力辞，濒行，馈遗甚厚，不能复却。

三月赴苏，由上海，五月旋里。

九月，凤年自南召来书，有该省“各大吏延请主讲大梁^[131]”之说，伊已面允，不得不从所请。

是年十二月，皇上因天花龙驭上宾。由此决不出山矣。

光绪元年，乙亥，六十四岁。

二月十五日赴河南。

三月到省，中丞钱调甫鼎铭方伯、刘冰如以衔廉访，舆紫垣本粮道、段雁洲晴川，执礼甚恭。肆业举、贡、生、监二百余人。为之整理文风，勗以“立品敦行”为有用之学，各生徒俱受教唯谨。凤年调署兰仪，去省九十里，以便定省，家口留寄书院内室。

七月，决科后旋里。是科乡闈中试举人三十三名。

九月，文漕帅由浦专弁来迓^[132]，不能再却。年底旋里。

光绪二年丙子，六十五岁。

二月，又赴大梁。中丞李小湘庆翱。是科会试，肆业诸生，五人中式，内联捷^[133]三人。

八月旋里。秋闈中式三十四人。

十月，又赴清江，年底旋里。

凤年题补^[134]桐柏县缺，充外廉对读官。出闈，调署怀庆府之原武县。

光绪三年，丁丑，六十六岁。

因大梁馆道远，辞却。直东晋豫连年大旱，人相食。

五月，文漕帅复迓至浦。中秋归里。重阳后两少君旭之延煜、（癸酉举人，户部主事）敬臣延熙来涛从学；其弟理臣延变、季芝延照，均以课^[135]送闈。同邑诸生请业者甚众。是科会试，大梁书院中式亦五人，内联捷四人。

凤年请开缺归，知府班铨选分缺先用。以覃恩敕封麟年生母封氏为恭人。

光绪四年，戊寅，六十七岁。

二月二十三日，接风年儿凶耗：于是月十三日巳时，因在原武任内赈抚饥民，开缺后积劳身故。痛裂五中。

五月初三日，柩眷归里。停厝西宅正屋。以堂侄芝年子为嗣，取名汝绳，年甫六岁。俟麟年生有长子，仍令承长支嫡嗣。

光绪五年，己卯，六十八岁。

闰三月初十日，厝亾儿于石梁东园。次婿王肇震补江苏徐州府睢宁县缺，十月到任。文漕帅两少君延熙延照同科中式。本邑中式及门侄孙汝为一名，郑熙嘏一名。

光绪六年，庚辰，六十九岁。

家居未出门。李爵相^[136]来书，劝令出山，辞之。归宗堂侄翰年入学。

光绪七年，辛巳，七十岁。

东抚周中丞恒祺，聘主省城泺源书院，勉应之。

四月十九日至省，知慈安皇太后升遐^[137]之信。

闰七月回籍。料理幼儿麟年应试。后天气渐寒，不复回省，并函辞来年之局。

光绪八年，壬午，七十一岁。

未出门。次婿王肇震调署宿迁县，三月到任。旋奉奏调淮安府清河县缺。

《编年自记》注释

[104] 倡捐：倡导捐款。

[105] 鳩工：即纠工，组织集合工匠。

[106] 即：到。

[107] 董：正，负责、主管。

[108] 嗣：之后，接着。

[109] 指省：清代捐纳制度中，通过捐纳取得官员资格后，如果自己希望到某一省去候补，就再交一笔费用，可以自主选择去处，称为“指省”。

[110] 洋铳：一种火枪，西洋兵器。

[111] 府经：知府的属官，负责出纳、文书之类工作。

[112] 铨选：铨，本指衡量轻重的器具。《汉书·王莽传》：“考量以铨。”应劭曰：“量，斗斛也；铨，权衡也。”后比喻量才授官。铨选，唐宋至明清选用官吏的制度。一般由吏部按规定选补某种官缺。凡经过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资格的人均须到吏部听候铨选。

[113] 朔：古代时间名词。旧历每月初一谓之朔，每月十五谓之望，十六谓之“既望”，月末日为“晦日”。或称为“月杪”。

[114] 甫：刚刚。

[115] 反噬：反咬、反诬。

[116] 递：接着。

[117] 部覆：指吏部批覆的文书。

[118] 绌：缺乏。

[119] 哗溃：哗变溃乱。

[120] 内擢：提拔做朝官。擢，提拔。内，指朝内，与“外”相对，在朝廷做官叫内官；在地方做官称外官。由朝廷到地方做官叫“外放”，与“内擢”相对。

[121] 从九品：封建社会清朝：九品十八级：官制中的第十八等级。清代的官吏等级制度沿用了自汉魏六朝以来的“九品十八级”基本制度，每一品有正、从（旧



丁守存祠堂旧址

读zòng)之别，如正一品、从一品。此外还有超品官员，宗室不入八分辅国公、八旗蒙古王公和非宗室封爵伯以上的，都视为超品。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122] 花翎：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饰于冠后，以翎眼多者为贵。一般是一个翎眼，多者双眼或三眼。开始时惟有功勋及蒙特恩者，方得赏赐。咸丰后，凡五品以上，虽无勋赏亦得由捐纳而戴一眼花翎；大臣有特恩的始赏戴双眼花翎；宗臣如亲王、贝勒等始戴“三眼花翎”。

[123] 用：因，因为。

[124] 花样：疑为花祥，祥，祥瑞，祥兆，提前有花的祥瑞之兆。

[125] 武闱：闱，考场。武闱指选拔武举人的考试。

[126] 丁忧：父母去世，叫丁忧。（见前注）

[127] 蠲：同“捐”，免除的意思。

[128] 正庆：六十岁寿庆，俗称正庆，也叫花甲之庆。

[129] 介祝：介绍，祝贺。

[130] 归省：归，回家；省，探视。归省指回家探亲。

[131] 大梁：河南开封，当时为河南省会。

[132] 迓：迎接。

[133] 联捷：蝉联捷登。此指参加各种科试接连中式。

[134] 题补：上奏章批准后补官。

[135] 课：课业、学业、作业。

[136] 李爵相：指李鸿章。李曾送丁守存“一门三进士”门匾。

[137] 升遐：升天，至高远处。张衡《思玄赋》：“涉青霄而升遐。”古代称帝王死去为“升遐”，亦称“登遐”。

“精诚”三解

——近读高树迎

惠东波

高树迎主任告诉我：“我们国家的医生，尤其是中医，一般没有西方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词那样的仪式，但我们有历代留下的‘大医精诚’四个字，这就足够了，把对一名好医生的一切要求都包含了。”

我似懂非懂，但意识到一定深奥无穷，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资深老中医：原临沂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山东省中医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临沂中医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临沂市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他科研成果丰厚，著



有三部儿科专业专著，分别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等高端出版单位出版，学术论文数十篇……还有我面前放着的厚厚一沓获奖证书、荣誉证书、聘书的复印件等等。这些，都令我不得不倾耳聆听。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似乎有所领悟，逐步对前面那句话有了些许理解。

之一：坚守你的专业精神

1977年，高树迎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山东中医学院。高考成绩是真的优异，在全临沭县名列前茅，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他选这所大学、这个专业，有点“低就”了。其实，他只是听从了家人的建议而已，而家人建议的理由，只是当地有一个小有名气的老中医，一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医好患者无数，方圆百里口碑相传，声名远播。这样的职业，与人与己都好，甚至可以称为崇高。高树迎想想也是，愉快地踏上了征途。就这么简单。

中医学院的学制为五年，可谓漫长，对于家庭条件不宽裕的高树迎来说，还伴随着艰辛。入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他便在学校勤工俭学。之后，每逢假期，他总会舍弃家庭团圆、同学聚会、游玩休息的时间，为县里的水利工程砸石子。他把从苍山拉回的大块石头，一锤锤地砸成鸽蛋大小的石子，每锤下去，头上挥洒着汗水，心里却有一种金石为开的感觉。五年，他的全部学费都是自己勤工俭学挣下的。

自力更生创造的只是潜心求学的条件，高树迎回忆说，刚入学时，自己的专业思想并不是那么牢固，只是略显被动地、本能地要求自己完成该完成的学业。然而，随着课程的深入，他逐步被祖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迷住了。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不厌其烦地请教，力求获取比教学要求更多的知识；他的专业是中医但不拘泥于中医，涉猎了很多相关的西医知识，以求触类旁通；他还苦读外语，强化自身观察世界学术动向的本领。毕业考试，他的十几门业务课平均成绩97分，令老师、同学咋舌。他知道，中医药学已经成为他生命不可分离的部分。

毕业后，高树迎被分配到临沂市中医院。按他个人的心愿，想分到诸如心血管之类的“大科”，但却被分配到儿科，似乎小了一点，“小儿科”嘛，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负面的思维方式。从医要有“大医”之目标，不做庸医，而科室、专业则无所谓大小，都是治病救人的平台，区别只存在于你怎么干，干得怎么样。他一头钻进紧张而琐碎的工作中，不遗余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向老大夫及同事们学习，在临床实践中历练，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

1985年，高树迎组成了幸福的家庭，次年，迎来了可爱的女儿，加上事业的上升，他似乎可以满足。这时，他却在四、五年的临床中，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遇到难题，他时常为自己的无奈感到焦虑。他要向名中医的目标前进，他特别希望继续学业上的深造。这时，他注意到母校的导师靳祖鹏正在招收研究生，靳教授是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自1982年起面向全国招收一名中医儿科研究生，却因无人过分数线连续三年空缺。这一年，高树迎抓住机会，全力备考，以420分的绝对高分被录取，超过录取分数线整整50分，这在临沂全地区在职医生中是第一个。于是，他又开始了三整年的求学生活，把家庭的一切担子留给了爱人。爱人是一名护士，三年内又要工作，又要育儿，住在10平方米的风子里，含辛茹苦，但从来没有抱怨他，以保证他安心读书。

三年过去了，他学成归来。对家庭妻儿，他深感愧疚，对事业，他自感忠诚，因为，那是他的选择。

之二：提升你的精湛医术

30多年的从医生涯，高树迎究竟诊疗治愈过多少患者，已无从计数，因为在这家医院时间太长了。他告诉我，每每在街上散步，不出百米就有人和他打招呼，人家对他热情洋溢，他对人家似曾相识。

他早期对呼吸道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小儿呼吸道疾病及免疫性疾病，特别擅长。结合传统中医理论，联系现代生活方式，综合分析，缜密论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小儿“肝旺、肝火”在现代小儿疾病中占有重要作用，因“肝旺、肝火”而产生的小儿多动、发热抽搐、惊厥等病理特点较成人突出，加上现代儿童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如看电视电脑太多，久视伤血，肝藏血，肝血肝阴伤，则肝阳上亢；如学习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活动减少，肝气郁滞；如目前食品中添加剂较多，且多以辛辣甜干油腻为主，久食容易伤阴血，辛热化火；如滥用抗生素、激素，容易使儿童出现烦躁、多动、易怒、睡眠差、舌质红等，这些“肝旺、肝火”症状都会导致儿科疾病的发生。这一学说的提出，好像一把打开儿童诸多疾病的钥匙，针对不同病理及表现，有的放矢地采取平肝、清肝、柔肝、缓肝、疏肝等多种治疗方法，从而显著提高了疗效。没用几年，高树迎医生对一般性儿科疾病的神奇效果便不胫而走，患儿家长的赞叹声不绝于耳，传播开来。

与一般性疾病的治疗相比，对生命的抢救更显出责任感的重要和医术的决定性作用。1995年，一名患格林巴利氏综合征的住院患儿突然全身青紫、呼吸困难，按一般规律讲，这种情况多为呼吸肌麻痹所致，但高树迎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冷静仔细观察，发现患儿呼吸动作正常，三凹征明显，果断认定为原因是呼吸肌无力、咳嗽反射减弱、痰液阻塞气道不通所致。他马上请耳鼻喉科医师会诊，行气管切开术。切开的一刹那，痰液溅了他一身，他全然不顾，立即吸出大量黏稠痰液，患儿呼吸应声改善。之后医生介绍，如不按高医生所嘱，痰液将会进一步向下级细气管堵塞，患儿将生命不保。患儿家属无不惊出一身冷汗，连称高医生是救命恩人。

2008年4月，小儿手足口病在临沂局部蔓延，一时社会上传言四起，人心惶惶，



引起了卫生部及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此时，作为儿科主任的高树迎，理所当然地被推到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他密切关注着疫情变化，认真研究对策，查阅学术资料，率先推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总方案，细化了初期、中期、并发症、恢复期等分期治疗方案。随着患儿的不断增加，病床爆满，医院开辟了第二病区，每病区仅4名医生。至6月份以后患儿达到高峰，住院患儿近百人，门诊就诊患儿达数百人。这时高树迎决定，全科医护人员取消休息日和节假日，加班加点，全力以赴。由于过度劳累，高树迎一天晚饭后突感头晕目眩，恶心呕吐。他知道这是极度疲劳所致脑缺血，对症服药后，第二天又出现在岗位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疫情控制以后，高树迎的对儿童手足口病的预防、治疗实践，在全省儿科界产生很大的影响，省卫生厅指名请他参加制定儿童手足口病的治疗方案。不久，山东省有了自己的明确的治疗分步原则，其中也包含着他的汗水、心血和智慧。2009年，在一定范围内又有手足口病流行，市中医医院儿科在他的带领下，连续几年治愈率为100%，无一例死亡，科室也被授予“全市防疫先进科室”称号。

高树迎的专业是儿科，但这绝不是他涉足的界限，因为他归根到底是一位中医，终极目标是治病救人。多年来，他抓住一切机会开拓知识领域，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副鼻窦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引起业内关注。1992年，7岁的苍山县患儿曹凯旋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天津血液病研究所治疗无效，嘱患儿输血维持生命，经他治疗服中药3个月，血检正常，又治疗两个月，至今未复发。

一位45岁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经用激素、静丙治疗无效，继发脑溢血，生命垂危，高树迎第一次见到这位患者时，其血小板为0，在某医院刚行输血，病情危重，经他中药治疗3个月，血小板升至正常。近年来，他摸索用纯中药对小儿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近30例，治愈率达到70%。

从患儿到成人患者，从常见病患者到危重病患者，从个例到公共疫情，对高树迎来说，其份量是一样的，责任都是重于泰山，只有这样，他精湛的医术才会体现价值，他才会从中体会从医人员的欣慰与快乐。

之三：奉献你的赤诚之心

大医，必有大格局、大爱心，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群体，概莫能外。

郯城县李庄镇有个叫小姣的小姑娘，患糖尿病多年不愈，已有并发症迹象。找到高树迎，他热情接待，悉心把脉，开了几副中药。小姣母子家庭困难，为药费发愁，此刻药房告诉她们，一百多元的药费，高主任已经付上了，原来，高主任已在交谈中了解到小姣家的窘境，伸出了援手。一周后，小姣母女来复诊，告知很有效果，高树迎又对药物做了调整。更令人感动是，当他得知助手将“小姣”写为“小娇”，从而影响报销时，指定助手办理了更正手续，感动得娘俩流下了眼泪。

高树迎还能熟练地说出一个患者的名字和他颇为繁琐的地址：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沾河林业局防火林政办幸福前指朱彩芹，原来这位有着女姓名字的男士是个林场临时工，原籍是临沭县，性格有些孤僻，被派在一处只有一个人的深山护林点中看林，前些年不慎被小咬叮咬，处理不及时，形成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病情重了，被人抬回老家，见到高树迎时，已经腹水。高树迎主任当机立断，用激素缓解症状后，吃中药治疗。几个月后，病情大为好转，朱彩芹欲回岗位，但苦于当地无法抓药，难以继续治疗。高树迎说，你放心去吧，中药由我来寄。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高树迎硬是坚持每两月去邮局寄药，因此地址记得烂熟，连邮政局的员工都认识了他，时常提供方

便。朱彩芹彻底被高主任的帮助感动了，只有以好好工作来回报，到病彻底痊愈时，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开始，高树迎将信将疑，到百度上一搜，果然不假。他说，那一刻，真有成就感。

高树迎1993年任儿科主任，那一年，我市一家大型企业幼儿园一天内有300多个幼儿发烧咳喘，他立即与同事赶赴现场，提出让患儿立即全部撤出现场的建议，统一制定了治疗方案，主动请缨承担了大部分患儿的治疗，把200多名患儿分散到全院各业务科室，他则不停地奔波、观察、调整方案，应付突发状况，一连三天三夜没合眼，小患者们纷纷转危为安。

这个事件似乎蕴含着一种暗示，事业总会从困难开始，经过不懈努力，达到一种圆满。那时候，儿科真是“小”科室，一年就诊量区区3000人，而现在，增设了新生儿监护室、小儿康复科等，达到四个科，年就诊量3万人以上，总床位达到100张以上，在全院可谓举足轻重。

随着事业的攀升，高树迎也到了退休年龄，社会上许多单位想聘他过去，许出数十万元的年薪，但他不为所动。他知道中医的经验宝贵，中医“老”的价值，他还要为中医药发展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他还想继续为患者服务，让更多患者因康复露出笑容。

对“大医精诚”的诠释永无止境，他想继续下去。



市史志办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11月初，市史志办组织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并开展研讨交流。就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朱海涛主任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提高认识，把全办干部职工思想统一到六中全会精神上来。二是组织好学习宣传活动，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三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以上率下，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四是制订专项学习计划，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高潮。五是联系实际学，推动史志工作走在前列、做出表率。

《临沂年鉴》2016卷出版发行。11月，由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主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的《临沂年鉴》2016卷出版发行。本卷年鉴成书92万字，主要记述2015年临沂市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政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力求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临沂的总体面貌和特点。

《沂蒙名医——临沂市中医医院》出版发行。11月，沂蒙史志典藏书系继前期出版《沂蒙名医》《沂蒙百家》《老城夜话》《铁军大帐追歌行》后，又出版了《沂蒙名医——临沂市中医医院》。该书由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全书25万余字，图片近300幅，从医疗人才成长的角度，详细记述了临沂市中医医院建院40周年以来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形成特色、不断进步的历史。

市史志办组织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市史志办于11月中旬组织开展了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活动。本次竞争上岗工作的各个阶段均秉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拔任用市方志馆馆长1名。

市史志办参加全省方志理论研讨会暨方志期刊座谈会并作典型发言。11月17日，全省方志理论研讨会暨方志期刊座谈会在济南召开，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史志办参加会议并就《沂蒙史志》办刊经验作典型发言。

市史志办参加全省方志馆工作会议。11月18日，全省方志馆工作会议在东营市召开，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临沂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参加会议。

市史志办开展“受教育、亮承诺、见行动”主题活动。为全面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市史志办在全体党员干部中组织开展“受教育、亮承诺、见行动”主题活动。截止目前，已开展集中学习30余次，县级干部为党员干部上专题党课5次，党员撰写个人心得体会40余篇，党员干部公开承诺事项30余条。

市史志办开展“党员画像”主题实践活动。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教育学习，市史志办组织开展了“党员画像”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14次，学习党章、党规7次，在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的基础上，10月底布置了党员写“三张画像”、谈心得任务，每人写出了2500字以上的“三张画像”党性分析材料，11月17日组织全体在职党员进行了集体讨论，取得良好效果。

《莒南年鉴》2016卷正式出版。11月，莒南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莒南年鉴》2016卷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莒南年鉴》2016卷设特载、大事记、专记、县情综述、政务、人物等28个栏目，文字总量91万字。

《沂水年鉴》2015卷出版发行。11月，沂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沂水年鉴》2015卷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沂水年鉴》2015卷设24个栏目，共85万字。

郯城县史志办组织党员到淮安周恩来故居进行现场教育。11月5日，郯城县史志办组织全体党员到淮安开展“两学一做”现场教育。全体党员先后参观了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并在纪念馆前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宣誓仪式。

兰山区强化对区志编修工作督导。为推动区志编修工作扎实开展，兰山区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从11月3日开始，集中利用两周的时间，对各承编单位的区志编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目前全区114个承编单位全部启动区志编修工作，37个单位对承编内容进行了修订，26个单位将任务责任进行了分解落实，正在集中开展资料搜集工作。